



記憶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6年9月30日第23期
总第169期

REMEMBRANCE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169期

目 录

【专 稿】

王复兴 北京四中的学潮与社教

【考 证】

余汝信 《戚本禹回忆录》指谬（一）

- 1、我与戚本禹的交往 2、关于毛泽东批评彭真 3、关于“五一六通知”
- 4、关于设立中央文革小组的通知 5、关于戚本禹与中央办公厅

余汝信 《戚本禹回忆录》指谬（二）——关于严慰冰匿名信案

【评 论】

（英）李 劫 毛时代的“黄金岁月”

——评《解放的悲剧：中国革命的历史，1945—57》

【字清谈画】

王宇清 那些年我们是怎么画画的（三）

——“大跃进”年代的“美术乌托邦”

【述 往】

郭小林 死亡行军——气象员邝浩泉之死

王丕忠 镇反纪实：我的劳改三十年（八）——农工队阶段

【读者来信】

1. 读者谈向红之文及其专案 2. 横泽泰夫、秋山枫叶谈老舍
3. 范世涛谈“红八月”的自杀 4. 读者谈范世涛的文革研究

【本刊声明】

【专稿】



作者简历

王复兴，1965年毕业于北京四中并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1970年3月从北京大学毕业；1978至1981年于河北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学院)任世界史教师；1981年4月移居香港；1987年与万润南合作创立香港四通公司（北京四通集团分公司），任董事、进出口部负责人；1992年任香港创恒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03年退休；2010年移民美国德州奥斯汀；现为中国文革史独立研究者。著有：

《也谈北大文革史中的一些片段——简评章铎、常风之争》（《记忆》第147期，北京大学文革专辑七，署名：辛伯仁）；《北大工军宣队领导下的清理阶级队伍——翦伯赞是怎样自杀的》（《记忆》147期，北京大学文革专辑七）；《迟群草菅人命，任由血吸虫肆虐》（《记忆》152期，北京大学文革专辑八）；回忆录：《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回忆录》（美国南方出版社，2016年9月出版，并由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自《记忆》155期起连载节选章节）；学术论文《“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产生原因初探》（待发表）。

北京四中的学潮与社教

王复兴

- 一、四中学潮的背景
- 二、高干子弟闹学潮
- 三、社教运动
- 四、社教的后遗症

从1962底至1966年文革爆发，在中国大地上，曾发生过一场席卷全国城乡的“四清”运动，又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这场社教运动是个阶级斗争的大战场，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及练兵场。在当时非常罕见的一件事是：北京四中这所著名中学也曾经历了一场社教运动。发生的时间是1964年12月28日至1965年8月4日，历时七个多月。笔者当年是四中65届高三4班的学生，亲历了这场中学的社教。四中的社教是由此前发生的学潮所引起。

文革的红卫兵运动首先发端于清华附中，而四中的学潮与社教则早于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萌动，是红卫兵运动的序幕与预演。

北京四中建校于1907年，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最初校名叫顺天中学堂。自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起，在袁世凯、张之洞等洋务派大臣的推动下，清廷废除了科举，参照西洋成规施行了癸卯学制，社会教育的格局为之一变。四中正是那个时代的产物。1912年改名为京师公立第四中学，1949年后定名为北京四中，是个男校。地址在北京市西城区西黄城根北街2号，离西什库天主教堂很近。四中发展到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中，以教学质量高、大学升学率高而著称，每年考入清华、北大的学生较多，从而闻名于海内外。正因为如此，四中高干子弟云集，不乏国家主席、政治局委员、元帅、将军、中央各部部长的子弟。四中的这些高干子弟穿着朴素，骑自行车上学，许多人在学生大食堂吃饭，大多数学习成绩不错。但他们有着一一种莫名的优越感，课下喜欢扎堆儿，谈论国内外大事，议论各种小道政治消息。喜欢议论谁谁的爸爸是谁，谁谁的爸爸说什么了，谁谁的爸爸去那位高级领导家里了，等等。他们与平民子弟之间有着一一种无形的隔阂。当年四中的学潮与社教，主要是由四中的高干子弟推动而发生。高三年级是重灾区。

一、四中学潮的背景

1964年秋，四中发生了学潮，其背景如下：

背景一：学习“九评”，反修防修意识高涨。自1963年中共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每一评发表时，四中全校都停课听中央广播电台广播，然后政治课学习九评。同学们下课议论最多的是中共中央代表团与苏共中央在各种会议上或会下的争论、斗嘴等大、小道消息。高干子弟这方面的小道消息特多。在学九评中，学生们反修防修的意识高涨，洋溢着一种浓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认为苏共变修了，世界革命的中心转移到中国了，毛主席是国际共运的导师，是“老大”。对毛主席由衷地崇拜，十分自豪。

1964年春，高三5班同学王小彬（干部子弟）给中央写了一封信，系统地批判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观点”。后来听班里的高干子弟说，毛主席看了此信，并说，“我们的中学生能写出这样的反修文章，小将向我们挑战了！”据说周恩来总理在一次关于反修的报告会上，表扬了四中学生王小彬，说，“看，这就是我们有觉悟的接班人。”从此事可以看出，四中学生反修防修气氛之浓。

背景二：“四清”运动，阶级斗争观念空前强烈。中共中央指导“四清”运动的文件“前10条”和“后10条”下达时，四中全校都停课听广播传达。文件中说，“当前中国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向我们猖狂进攻。”要“民主革命补课”，“要重新组织阶级队伍”，要“扎根串联”，“成立贫协”。要打击“四不清干部”。等等用语令人震惊，令人振奋。学生们被鼓动得革命热情高涨。农村“四清”中的各种故事在学生中流传，同学们恨不得马上投入到阶级斗争的洪流中去。

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社教问题的工作会议，会议提出：“全国基层三分之一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可能还不止。”此一说法当时在四中学生中广为流传，同学们都十分吃惊，纷纷觉得自己阶级斗争观念太差，太跟不上形势，决心要快马加鞭紧跟形势，为保卫无产阶级政权而战。

背景三：1964年《人民日报》公布了毛泽东对文艺界的两个批示，对四中学生影响很大。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批示：“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

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艺术，岂非咄咄怪事”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批评文艺界“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随后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开展了革命大批判，批判文学、艺术、电影、戏剧、音乐、教育、哲学领域的封、资、修。报刊上大批判文章无日无之。学生们业余时间都爱看电影，原来爱看的一些电影也被批为“大毒草”，如《早春二月》、《北国江南》、《舞台姐妹》、《林家铺子》、《聂耳》、《怒潮》等等。于是学生们生怕掉队，紧跟形势，努力以阶级分析的方法去分析文学艺术作品，分析一切。笔者所在高三4班在学潮初起时，革干子弟宋杨之在语文课程老师讲述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时，突然举手后站起发言，批评教语文课的程老师散布资产阶级情调，并批判朱自清的《荷塘月色》是宣扬世外桃源和阶级斗争熄灭论。这是学生受社会上革命大批判影响的具体一例。

背景四：传达、学习毛主席对毛远新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1964年11月高教部转发了《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四中对教师、学生进行了传达。毛主席对毛远新痛斥了现行教育制度，“反对注入式教学”，提出“阶级斗争是你们一门主课。”毛主席关于“学生负担太重”的批评尤受学生欢迎。毛主席反对以学生为敌人，反对“用考试对学生搞突然袭击”，这很对学生的口味，使学生们感到伟大领袖最体贴自己，是站在自己一边的，要跟着毛主席开展教育革命。

四中学生中蔓延着要开展教育革命的思潮，特别是高三年级的高干子弟，他们很快步入了“教育要革命”的实践，闹起了学潮。

二、高干子弟闹学潮

1964年10月，北京市西城区的四中、六中、八中等中学的高干子弟相互串连，认为学校的阶级路线存在问题，出身不好的干部、教师重点培养出身不好的学生，排斥干部子弟；认为学校忽视政治教育，重视分数，培养学生走白专道路；认为应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开展阶级斗争，学校应搞教育革命。四、六、八中先后闹起了学潮，此即所谓发

生在1964年秋季的“468学潮”。四中的学潮主要是由高三年级的的高干子弟领头闹起来的。

前文提到，笔者所在的高三4班，曾发生语文课上革干子弟宋扬之批评语文课老教师程先生讲授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是宣扬资产阶级情调，并批判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宣扬脱离阶级斗争的世外桃源，散发小资产阶级情感。这是个标志性事件，学潮自此温度骤升。而后大约在同一天，高中各年级、各班在教室后墙贴满了小字报。有批判白专道路的；有讲阶级路线的；有批判语文教材的。笔者在外班高三3教室后墙看到宋克荒（宋任穷之子）一篇长篇小字报论述党的阶级路线。

高三6班突然出现了批判本班“白专”同学鲁生卫的事件。鲁的父亲是国民党官员，是1949年国民党起义人员，时任煤炭工业部参事，应属党外的统战人士，但在当时阶级斗争愈演愈烈的形势下被视为国民党余孽。在教室后墙的小字报，周××同学有篇小字报点名批判同班同学鲁生卫，题目是《撕开伪君子鲁生卫的假面具》，内容开头就是一段耸人听闻的文字：“鲁生卫这个伪君子在中山公园光天化日之下耍流氓，侮辱妇女，被我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今天，撕开伪君子鲁生卫假面具的时候到了……”。

（后来经多方面核实，以上文字完全是歪曲事实，但很容易把人搞臭）。小字报接着说，鲁生卫“出身国民党反动家庭，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从不注意改造思想，伪装进步。”等。

接着在高三6班的一次语文课上，干部子弟张康平站起来发言，说他的作文得了2分，他念了作文后，质问语文课焦老师：“我的作文只值不及格吗？”（该作文政治立场鲜明，但过于简单，且文不对题）鲁生卫的作文得了5分，高干子弟苏承德举手发言，分析、批判了鲁的作文政治立场有问题。接着张康平又站起来拿起自己的作文本，走到鲁的课桌前，愤怒地把作文本摔到鲁面前，喝问：“鲁生卫，你说，我的作文应该得几分？，你的作文应该得几分？”在突如其来的事态面前。鲁懵了，没有回答。张康平当时愤怒地大声喊叫：“你站起来。”鲁站起后，仍然没有说话。这时，周××大喊，“太嚣张了，把他揪到前面去！”接着就一手拉着鲁的左臂，一手推着鲁的脖子，连推带搯地往讲台那边推。这时又有一位同学抓住鲁的另外一臂，两人一同把鲁推到了讲台。这个同学用力按鲁的头，让他

低头。不知所措的焦老师怯生生地说：“鲁生卫，你当众做个检查吧。”苏承德站起来说，“鲁生卫，你必须只检查政治问题，不能避重就轻，转移斗争的政治方向。”鲁慌慌张张，语无伦次地做了检查。终于熬到焦老师救星般地宣布下课。此时全班把目光转移到了泣不成声的李××身上。有人问李，“你怎么了？”李说：“阶级斗争太残酷了，阶级敌人太嚣张了。”然后他突然扑到鲁的面前，抓住鲁的衣服，大喊：“阶级敌人！阶级敌人！”

事实上，李××也是一个所谓家庭出身有问题，在政治运动中屡遭不幸的悲剧学生。他在政治运动的表演反映了极左教育和阶级斗争教育洗脑所造成的一类人的心理。他们把自己装扮成“革命形势”所需要的激进角色，努力表现自己“积极进步”的政治立场。李××在鲁的事件上的上述这种表现已经不是第一次。在一次参加毛泽东支持美国黑人斗争声明的天安门集会上，当毛泽东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时候，李××表现得激动不已，狂呼万岁。当天回到学校以后已经是下午自习课，李××进教室以后没有回自己座位，却径直走到鲁的座位前，当众质问鲁，为什么你见到伟大领袖无动于衷？质问得鲁惶惶然无言以对。但李在运动中并未能免受冲击，并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利。

一天，庞××同学给鲁写了一页纸的“规劝信”，内容是要鲁认真对待政治运动，要自觉改造等等。于是鲁从作业纸上撕下一小条，简单地写道“谢谢，一定按照你说的办。”意想不到的这竟然是正在争取运动中“火线入团”的庞××设下的一个圈套。庞立刻写了小字报，题目是《和风细雨可以休矣》，把鲁回的纸条贴了出来，称这是鲁抗拒改造，抵触运动的实际行动，主张对鲁采取疾风暴雨的打击。接着，在周××的支持和配合下，庞向鲁索要他写的“规劝信”原件，称要和鲁的小条对比张贴，鲁说找不到了（实际是被鲁销毁了）。于是庞协同周××，在下午的自习课上，周××厉声呵斥，令鲁离开座位，周、庞两人动手搜查了鲁的书包和课桌，当然什么也没有找到。这次被搜查的屈辱令鲁痛不欲生，到了晚年仍难以忘怀。

此后，团支书高艳华（后改名高峰）作为班干部代表宣布，“从今天起，每天下午鲁生卫不得参加第三、四节的自习课，到阶梯教室写检查。直至检查通过为止。”鲁很庆幸

这一“惩罚”决定使得他能躲开自习课的骚扰。当时高艳华还指派两个同学每天陪鲁一起骑车回家，一个同学顺路，另一个同学并不顺路，是特别陪同、护送。鲁本人感觉这种安排有“监护”的意思，而当时他脑中确实曾闪过轻生的念头。同学的“护送”使他感到一种人性的温馨，而暗存感激。

鲁生卫在这种自发式的乱哄哄班里召开的批判会上，让他交待反动思想，鲁被击懵，并不知道有什么可交待的，只好沉默。批斗会开的十分激烈，周××同学表现得尤为激昂，应是为表现其革命性，但因其并非高干子弟，因此并没能因其十分激进而进入班里的核心小组。为收集鲁的“罪证”，6班七、八个人一哄而起去鲁宅抄家。据苏承德回忆，去鲁家拿走了鲁的日记本、笔记本，没动其他物件。

鲁毕业时“政审”过不了关，没能考上大学。文革后苏承德曾两次向鲁生卫诚恳地道歉。张康平在文革后经常到鲁生卫家看望，二人都不提过去事，成为相互关心的好友。

鲁生卫在逆境中自强不息，自修成为机电专业的专家。在笔者对鲁采访时，鲁回首往事，说：对当年的批判“我所没想到的是激烈的程度”，“扪心自问自己是否对过去存在怨气，我发自内心的想法是我怨恨那个时代”。“历史已经翻篇了。我内心的真实感受，非常不愿意纠结和缠绵那些不堪回首的过往，受迫害也不是同学的过错，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孩子……”鲁要求绝对不要公布他的真实姓名，因那是一段太痛苦的经历，他不愿打破心灵的平静。他说：“半个世纪以来，我肯定和曾经在四中小文革中受到迫害的同学一样，轻易不愿意去回顾那段不堪回首的经历。无论是在当众的场合，或者自己私下里，都有意识地回避回忆，不愿意总是去戳伤疤。”由鲁所吐露的心声，可看到当年对他伤害之深。由于当事人的再三要求，笔者隐去了当事人的真实姓名，用了“鲁生卫”这一代名。

紧接着发生的，是许多班发生了“夺权”。由高干子弟向家庭出身非红五类的团支书、班长夺权。这是仿效农村“四清”运动的夺权斗争。高三年级有六个班，其中三个班出现了“夺权”。笔者所在的高三4班，原团支书李峻（干部子弟，其养父在1959年被批判为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生父于1949年去了台湾。）被刘安东（水电部常务副部长、党组

书记刘澜波之子）代替；班长杜文（父亲是中医）被杨东胜（杨成武之子）代替。一天高三4全班开会，刘安东主持班会，宣布了“领导班子”的变化，没有讲任何理由，没有这经过改选程序。

同一时间，高三6班的团支书高艳华（后改名高峰、家庭出身小商贩）被高干子弟谭笑曼（父亲是总政秘书长）代替，高艳华因不是革干子弟而改任班长；高三3的团支书史晓星被邱承光（邱会作之子）代替。其实史晓星也是高干子弟，但其家庭背景涉及到党内斗争，他父亲陈光是原红一军团代军团长、115师代师长、四野纵队司令、四野副参谋长、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其性格刚烈、火爆，与林彪、叶剑英曾有较深矛盾。1950年在广州处理城市工作及港澳台情报工作中犯了错误，被过度批判，并被中央错误地定为“反党”，开除党籍、撤职并软禁于武汉，是冤案、错案。陈光于1954年6月7日自杀身亡。史晓星竟因其父这样一个背景，也被夺了团支书的权，可见当年高干子弟们受父辈权力斗争影响之深，十七、八岁的中学生已相当政治化。陈光于1988年4月被中央平反、恢复了名誉。后来史晓星为纪念父亲，著有《陈光》一书，并从母姓改回父姓，改名为陈晓星。

在四中的学潮中曾发生了一件十分新奇、怪诞的事情。高三2班曾发生一件外班团支部（高三其他几个班的团支部）跨班到2班发展团员之事，目的是为着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发展一名高干子弟入团。高三2班的学生李新桅（李井泉之子）不怎么求上进，不是团员。李新桅是由四川成都转学到北京四中上高中的，在四中住校，每个周末到贺龙家住。李井泉每次来京开会，李夫人都会到四中把儿子接走，有时正值上课时间，李太便会直接到教室门口吩咐老师把儿子叫出来接走。李新桅被父母接走一个礼拜左右，回校后通常气色很好，有的同班同学和他开玩笑，说他“又胖了一圈”。据说有的同学与他开玩笑时，摸他的头玩，嘲笑他，于是有的高干子弟同学说这是反映了阶级感情问题，是仇恨干部子弟。为发展李新桅入团，高三2班在阶梯教室召开了“联合团支部大会”，由外班团支部批准李新桅入团。而后高三2班团支书任小彬再召开2班团支部开会，补办了李新桅的入团手续。此事，已显露出了后来那个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一血统论思

潮的初端。似乎高干子弟是“自来红”，是当然的革命接班人。

在学潮中，有的班发生了学生斗学生，批判思想“反动”的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高三2班批判了马巨同学。马巨的父亲马宗霍是国学大师、教授。马巨学习成绩很好，有点傲气，与同学关系不是很融洽。马巨被批判阶级感情有问题，有人揭发他在三年困难时期，一次他们班到北海公园参加科技之家活动，回家路上，碰上一个衣衫破旧、褴褛的要饭的乞丐，马巨对同行同学说“这要饭的，风餐露宿，这么苦。看照片毛主席是穿皮大衣呀。”还有一次全班到天安门参加抗美援朝群众大会，当毛主席出现在天安门城楼时，同学们狂呼“毛主席万岁！”表现得十分狂热，而马巨被揭发表情平静、无动于衷。马巨被批为反动、反革命，被定为反动学生，没能上大学。他文革后在美国从事计算机管理工作。文革后同班校友聚会，同学们敞开思想畅聊，马巨惊讶地发现，国内校友们对党国体制弊病的认识、对神化领袖的祸害、对普世价值的追求，比自己深刻得多，说“我当年是右派，你们现在各个比我还右派！”文革后高三2班校友聚会，当年的团支书（高干子弟）任小彬多次诚恳地向马巨道歉，令马巨感到十分安慰。

受高三年级学潮的影响、低年级也闹起了起来。高一年级也未能幸免，也发生了批判学生的事情。当时高一2班的教室后墙上曾贴满了批判牟志京（父亲是知识分子、翻译）的小字报，有的小字报揭露他爷爷解放前是大富豪（其实他祖父在49年前早已破产）；有的小字报因他奶奶公私合营后曾领取过些微定息，因而说他奶奶有“变天账”，要他交待；有的小字报批判他有资产阶级恋爱观，只因他有一次碰上小学的一个女同学，女同学对他“噗嗤”一笑，他开玩笑说有过艳遇。有的同学还把他日记中的一些东西拿出来批判。文革爆发后，牟志京坚决反对血统论对联，在校内外到处与“老兵”辩论。他于1967年1月18日创办了《中学文革报》，曾刊登过遇罗克以“家庭问题研究小组”名义发表的《出身论》，在文革中曾产生过巨大影响。

当年推动四中学潮发展到社教运动的是高三的一批高干子弟。高三的高干子弟有个核心小组。主要核心成员有：邱承光（邱会作之子）、宋克荒（宋任穷之子）、杨东胜（杨

成武之子）、肖云（肖华之子）、苏承德（苏振华之子）、刘安东（水电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刘澜波之子）。邱承光是主要的召集人。开会地点有时在刘安东家，有时在肖云家。杨东胜其实政治热情并不高，他与笔者私交不错，私下对笔者讲，“我爸就让我好好念书，以后建设祖国。”他在核心圈只不过挂个名，跟着跑。杨东胜属于核心小组成员就因为他爸是杨成武。开始核心圈人较多时，有李新时（父亲是上海空四军的少将）、宋扬之（父亲宋之光时任驻法参赞）等人，他们后来淡出了核心圈，皆因父辈不够军级、部级以上官位或不在中央机构任职。从以上高干子弟核心圈组成的潜规则，可以看到高干子弟头脑中那种等级分明的血统观。这种等级分明的血统观，应是既来源其父辈无形的影响、熏陶，也来源于体制的潜移默化。

从以上四中学潮中学生们的思想、行为，可看到“狼奶”（阶级斗争观）对十几岁年轻人的身心影响之大。阶级斗争观把人群撕裂成对立的阵营，煽动仇恨与斗争。生活、学习在同一校园的同学，本应相互友爱、相帮助，却要对立、仇恨、揭发、批判、斗争。年轻人善良的人性被“狼奶”浸透、侵蚀、毒害。人性被阶级斗争观严重扭曲。这种悲剧，后来在文革中竟泛滥成灾。其根源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路线。

三、社教运动

1964年深秋，四中闹起学潮时，一些高干子弟给中共中央写信，反映四中学校领导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有问题，排斥革军、革干、工农子弟；出身地富、资产阶级的领导、教师重点培养出身地、富、右派、资本家的子弟；学校不培养革命接班人，而培养学生走白专道路。他们写了两封信，一封给中宣部、一封给北京市委。信写好后，高干子弟联合签名，有邱承光、苏承德、宋克荒、杨东胜、刘安东、肖云、宋扬之等人。写信日期是1964年12月20日。高干子弟自有通天渠道，一封信通过陆健健（后改名陆健，陆定一之子）递交给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另一封信通过傅洋（彭真之子）递交给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

陆定一收到信后，于21日转交北京市委。中宣部于25日在中宣部《宣教动态》114期上刊登了此信。发信一周后，27号左右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张文松出面接见了四中高干子弟三名代表：邱承光、宋克荒、苏承德。此次接见，张文松主要是听取意见，了解四中高干子弟想法，以便向彭真汇报。紧接着，北京市委由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万里出面第二次接见四中高干子弟，地点在台基厂北京市委大楼大会议室。这次四中去了几十个高干子弟，已毕业没考上大学而转到清华附中重上高三的贺鹏飞（贺龙之子）也去了，坐在宋扬之旁边。记得笔者那天上学，没见到刘安东，有同学告诉笔者，万里接见他们，刘安东也去了。过了一、二天，会议情况陆续传出，据说万里在会上批评他们是“娃娃”“瞎胡闹！”“不要党的领导，搞非组织活动。”针对他们反映四中领导培养学生走白专道路，万里说：“你们说红2分比白5分好，我看还是白5分好。”（当时学校实行百分制与五分制并行的分数考核制）。万里指着苏承德说：“你现在应好好学习，我会找你爸爸谈谈。”万里宣布：现在出“安民告示”，北京市委将派工作组进四中。

彭真派工作组进四中，目的是控制学潮，终止学潮，恢复学校正常教学秩序。四中工作队由市委文教书记张文松领导，由市教育局局长李晨带队进校、具体负责。

据李晨在《北京市中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回顾》一文记载，北京市委决定派工作队进驻北京四中的日期是1964年12月28日。

为着便于与高干子弟沟通，做思想工作，工作队的副队长有几位高干夫人，如副队长杨滨是时任国家经委、建委副主任宋养初的夫人；副队长孙岩是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林默函的夫人。四中高干子弟见她们，称呼：“杨阿姨”、“孙阿姨”。

四中社教刚开始时，工作队很神秘，如王光美的“桃园经验”那样，搞“扎根串连”。工作队住在四中附近的平安里厂桥的中直招待所。他们分别找高干子弟中的学潮积极分子谈话。苏承德回忆说，工作队与他谈话时对他讲：你们有革命热情，这应充分肯定。但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四中的领导是修正主义？还是革命的？要具体分析，头脑不能发热。学校开展革命化，要依靠党团组织。快要高考了，你应认真准备高考。

工作队采取了化整为零，分头谈话，降低温度的策略。

高干子弟并不是铁板一块。在工作队进校前后，高三2班的团支书任小彬（革干子弟）曾找校长、党支书谢才民，表达个人意见：“现在学生运动没有党的领导，学校的运动应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谢才民反问：“我的话他们听吗？”对任小彬表示了赞同与支持。任小彬文革后对笔者说，他当时属于建制派。

1965年1月初，工作队在阶梯教室召开了高三年级全体学生大会，工作队长李晨讲了话。笔者只记住了李晨的一句话“这次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社教一开始，工作队便矛头向下，开展了批斗反动学生的运动。工作队把高三4班毕向明定为全校重点批判对象。毕向明是笔者所在班的同学，他来自农村，祖父是富农。他重视学习，不大关心政治。全班召开了批判他的会议，工作队李同志在场坐阵。同学们批判毕走白专道路，还要他交出家里的“变天账”（指49年土改前的地契），这是学生们从流传的农村“四清”的故事中学来的。最后，工作队李同志做了尖锐批判毕向明的发言。

在高三4班一次批判毕向明的会上，大家“逼”毕向明交待反动思想，毕交待不出来就过不了关。再三逼迫之下，毕向明开始顺竿爬，胡说八道，他“供”道：“我曾想混进中南海，炸中南海。”“你根本进不去中南海，怎么炸？”“有的同学有进出中南海的证，我可以借证件。”毕“供”出反革命思想后，大家就“信”了。“逼供信”之后，自然是一片“打倒！”之声。会后有的同学跑去找工作队，要求枪毙毕向明。

当时高三其他各班都召开了批判毕向明的批判会。高三各班都进行批判的斗争对象，只有毕向明一人，他是被工作队确定的反动学生典型。毕向明被工作队定为敌我矛盾，被戴上“反动学生”的帽子，不让参加高考，毕业后被发配到北京团河农场劳改。毕向明是在四中社教中，被工作队定下的唯一一个敌我矛盾性质的人。文革中团河农场的人联合毕家乡的人差点把毕向明打死。文革后，毕向明找到当年工作队队长李晨，李晨说“孩子，你受苦了……”李晨为他写了平反证明，而后毕向明由四中接收，做基建工作。八十年代中期四中校友返校聚会，65届高三4班聚会由毕向明操办，同学们对毕分外热情，表达了

对他的歉意。刘安东两次向毕明非常诚恳地道歉。毕向明嗜酒，2002年因病去世，在京的二十多名同班校友全都出席了追悼会。苏承德文革后回忆工作队发动学生斗学生，认为是工作队为着平息高干子弟对校领导的愤怒情绪，转移目标，因此矛头向下斗学生。

中央关于社教运动的新文件“23条”下达后，四中的社教紧急“刹车”。“23条”含有两种精神，一方面有着对刘少奇主持制定的“后10条”中过左倾向纠偏的精神，强调团结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另一方面又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这种更左的内容。但北京市委只抓前者纠左精神，强调不能扩大打击面，而回避后者关于重点是整走资派。四中通过传达、学习“23条”，贯彻纠左，对运动进行降温、“刹车”。

1965年1月14日“23条”通过当天，北京市委召开六个中学高干子弟“训话”，同时让六个学校的校长、党总支书记、团委书记到会，听会。这六个中学是：四中、六中、八中、师大女附中、女一中、女三中。其中四中、六中正在进行社教，八中正在闹学潮。万里在会上讲了三个钟头，对几个中学的学生运动大泼冷水。万里批评高干子弟“自高自大、自以为是、自由散漫、自由主义，不听党的话。”，强调：“这个运动必须党来领导……没有党的领导还不是洪秀全、李自成？”还说：“你们的父母我都认识，别看你们爸爸比我官大，北京市要听我的。”（这里似乎暗示了党内的矛盾与斗争）万里说：“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学校要有正常秩序，不能乱来。”

1月17日，四中工作队给北京市委报告，说“发生一部分学生要求枪毙毕向明……我们曾立即加以制止。一部分学生也作了检讨。”

1月21日，彭真在人大会议堂河北厅做关于“四清”的报告，提到北京中学的学潮说“干部子弟也要一分为二，学校是党领导的。”“他们要革命，这种精神是好的，但办法不对。”“浮动、乱斗要停下来。”

1月22日，李晨向四中全体党员宣讲了“23条”。紧接着，工作队对全体学生宣讲了“23条”。师生们学习、讨论“23条”长达一个月。到了3、4月，四中的社教便停了下来，学校恢复了平静。高三学生忙于学习，准备高考。

发生在1964年秋的468学潮，演变到社教的有六中、四中，八中没有进行社教。在四中的文革回忆文集《暴风雨的记忆》中，有几位四中校友作者说，八中也进行了社教，这是不准确的。另外，六中的社教比四中早一个月开始。六中的高干子弟在学潮开始时给中宣部和团市委写信，反映六中的党支部、校长不执行党的阶级路线，干部子弟受压；校领导忽视思想教育；走资本主义道路。主要反映学校领导的问题。1964年11月18日，由中宣部主导，派出工作队，由团中央书记杨海波带队进驻六中。杨海波是向陆定一汇报六中社教。六中的工作队与后来市委派到四中的工作队，两者做法不同。六中的工作队发动师生批判学校领导、校长、党支书。后来有三人被开除党籍。多年后苏承德告诉笔者：“当时派工作队去六中的中宣部陆定一他们，与派工作队去四中的北京市委、彭真有矛盾，做法不同。”笔者认为：中宣部派去六中的工作队，其思路基本上是贯彻执行“后10条”，并受中央两位主席关于有三分之一基层政权已经“烂掉了”的讲话影响，进校后重点整学校的领导干部。而北京市委、彭真则对此潮流抵制、顶牛，反过来在四中矛头向下，整反动学生，要扑灭学潮。前者（中宣部）在紧跟中央的反修新战略，后者（北京市委）通过传统的反右斗争策略来阻挡扑向领导层的革命烈火。

同期在北京大学进行的社教（1964年7月至1965年7月），在初期与六中社教有些类似，同样是由中宣部主导，同样是发动群众整领导。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带领工作队进北大后，认为陆平党委“实际上走的是资产阶级的道路方向。”据说毛泽东当时曾说“北大是姓陆的整姓陆的。”即陆定一整陆平。“23条”下达后，张磐石被撤职，北大社教转由彭真、北京市委主导，召开了“国际饭店会议”，反过来整社教积极分子，批斗他们。这时北大与四中社教有些类似，都是矛头向下，打击“反党分子”。四中是中学，批斗“反动学生”；北大则是要把社教左派打成“反党小集团”，而后准备以去农村“四清”为名，把他们流放到农村劳动改造，不让回城了。北大社教初期与六中类似；后期则与四中类似。但到了1966年5月党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时，陆定一、彭真却同时被打倒了。毛泽东对陆定一与彭真并没有区别对待。彭真指导四中的社教与其“二月提纲”中的路线是一致

的，都是要阻止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要“降温”、“刹车”。《五一六》通知对彭真的“二月提纲”做了系统的批判，成为打倒彭真的重大理由。按说陆定一在指导文教口的社教中的表现是紧跟毛泽东的，但他却与彭真同时被打倒，这应是与彭、陆二人都被毛认为是刘的人有关，此外五月会议已确定成立新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做为毛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办事机构，那么掌管文宣大权的陆定一就必须靠边、腾空坐位了。陆定一被打倒还有个特殊原因，即严慰冰的写匿名信事件。

四中社教的后期与北大社教的后期相比较，有类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四中社教后期并没有整那些闹学潮的积极分子高干子弟，不但没整他们，而且还作为革命接班人重点培养他们。说到底，这些高干子弟是统治阶层的自己的孩子。四中在社教后期、高三学生毕业前夕，发展了几批学生党员。第一批是：任小彬（父亲任彬是北京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母亲杜若是西城区党委书记）、孔丹（父亲孔原是中央调查部部长，母亲许明是国务院副秘书长）。第二批有宋克荒（宋任穷之子）。还有第三批、第四批，都是高干子弟。高三毕业生还有三个高干子弟被保送中央党校，据说是要培养党的理论骨干，有：苏承德、宋扬之、任小彬。当时师大女附中也保送了三名高干子弟毕业生去中央党校深造。他们都进入了中央党校青训班。北大社教的积极分子都是基层干部、教师、普通党员，他们便没有四中高干子弟这种待遇了，他们只有挨整、下放农村的“份儿”。

468学潮的八中，闹学潮曾闹到要罢课，“23条”下达后，市教委说服了陈小鲁（陈毅之子）等高干子弟，结束了学潮。八中没有进驻工作队，没有进行社教。

高三毕业前，四中高干子弟核心小组的领头人邱承光曾被要求对工作队和校领导多次做检讨，尔后过了关。他没有被发展入党，也没被保送中央党校。邱参加高考上了大学。

四中的社教于1965年8月4日最后结束。四中领导班子被市委定为二类，属于基本好的领导班子。8月4月，李晨对四中党支部说：对四中的“结论”是：“四中没烂，成绩是主要的。”不久，校长、党支书谢才民被调离四中，杨滨被调到四中担任校长兼党支书。

保送到中央党校青训班的苏承德、任小彬、宋扬之，在文革爆发后，都参加了党校的

“红战团”，是康生所支持的李广文的对立派，“红战团”在1967年1月反康生，苏、宋、任等人被“中央文革”打成反革命。宋扬之当时批康生极左，指出康生早在延安整风搞“抢救运动”、在山东搞土改，就是极左。苏、宋、任三人从1965的反右到1967年初，立场转变为反极左。

四、社教的后遗症

四中社教留下了一个严重的后遗症。到了社教后期，四中的领导、党员、教师都唯恐在阶级路线上犯右倾错误，因此宁左勿右，这就在升大学上苦了许多出身黑五类的子弟。高三毕业生的档案里有“政审意见”这一项，由于这项意见写的“不好”，影响了许多德才兼备、学习优秀的毕业生不能升入大学。如果出身所谓不好，本人又不是团员，政治上所谓不追求上进，往往就会被“政审”卡住，高考成绩再好也没用。这给许多小年轻造成了终生的遗憾和伤害。在六十年代上半叶，这一问题始终存在，并不只是65届毕业生才遇到的无形的生杀关卡，只不过自1957年后愈演愈烈，到了1965年尤甚而已。对此一涉及人的平等受教育权的重大问题，涉及制度性出身歧视的问题，长期被人们忽视，很少被人提及。

当时党对青年学生的阶级路线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起点是首先要看成份，看家庭出身。随着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形势日益严重、尖锐，有成份论在“政审”中的份量也越来越重。文革时期有这样一件事：1968年北师大几个学生拿着“中央文革”的介绍信到四中调查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高考录取上的表现。调查高考制度是如何打击工农子弟，保护“黑五类”子弟上大学的。四中前负责高考生“政审”的教导主任屈大同接待了这几位来搞调研的师大学生。屈大同对他们讲：“恐怕不得不让你们各位失望了。”“告诉你们，每个学生的档案都有个表格，表格上有学校的‘政审意见’，只要建议不录取，考出大天，也上不了大学。”屈大同说：“给你们举个例子，知道钱伟长是谁吧？大

名鼎鼎的科学家、教授，是个大右派。他儿子钱元凯就是由于政治鉴定不合格，成绩再好也没用，哪个大学都没录取。这就是党的阶级路线。” 钱元凯当时在华北考区高考总分第二，报考了清华，但没有任何大学录取他。对此事，文革后屈大同一直感到很内疚。

1965年高考贯彻“阶级路线”之严，我们班的李峻是个典型事例，他是当年高考的北京文科状元，报考北大没录取。据说北大党委会就是否录取李峻讨论过二、三次，最终没敢录取。李峻只考上了北京经济学院。李峻养父于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的生父49年后去了台湾，成了重大污点。北大是否录取李峻，不是看他本人是否品学兼优，而是对其父辈如“审干”般进行“政审”。

1965年毕业这一届，高三2班所谓出身不好的学生多一些。据高三2班原团支书兼班长任小彬在文革后统计，他们班因家庭出身问题没能考上大学的有十几个人之多。这个班的吴铁生，学习成绩很好，曾获金质奖章，为人艰苦朴素，笔者还记得他穿的衣服从来都是打满补丁的旧服装。但他祖父是地主，父亲是右派。他本人曾在全校大会上做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报告，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家庭，表示要和家庭决裂，做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当时被学校领导树为出身不好但表现好、背叛了剥削阶级家庭的典型。但尽管吴铁生如此努力，他虽然考上了大学，但只考上了北京农业大学。他们班的同学都清楚，凭他的学习成绩，原本考上清华应不在话下。其中的奥妙，党的阶级路线是如何区别对待的细微之处，人们心知肚明。吴铁生现在英国从事计算机管理工作。他曾看到报刊上登载的四中燕纯义老师的文章《待到冰消雪融时——北京四中文革落实政策记事》，吴铁生看完此文，给校友们发了一条微信，被校友们广为传阅。吴铁生写道：“受害者不止这些人（注：指燕文中提到的受害的干部、教师、‘反动学生’），咱们初中班、高中班，就有许多受害者，特别是卡在考高中，考大学这两个门槛上。历年历届学生中的受害者，更是不计其数。什么时候能给这些人落实政策，送去‘党的温暖’？”吴铁生认为这个问题十分值得“探讨”。17年中，在全校、全市、全国范围内，历年历届的毕业学生中的受害者，确实是不计其数，是个巨大的黑洞。对这个庞大的受害群体，已经无法落实政策了，已成了无

法挽回之事。当年那些年轻的孩子，为人老实，学习刻苦，成绩优秀，却因家庭出身，被“政审”卡住，不能上大学，或不能上自己理想的大学，受到终生的损害，而这对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也是有害无益，使国家失去了大量可造之才。究其根源皆因贯彻、执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在学校贯彻“阶级路线”，实行“出身歧视”这种政治不正确所至。

文革前高考中关于学生“政审档案”的秘密，近年多有披露，据《共识网》2013年6月21日刊登袁剑平的《文革前的高考“不宜录取”政策揭秘》一文揭露：文革前中学的学校领导有责任在十分秘密的情况下，对高三毕业生每人进行“政审”，“政审结论”的主要依据，并非个人表现、品德，而主要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家庭出身地富反坏右或有海外关系、港澳台关系的，一般是“不宜录取”或“降格录取”。高考招生单位先看“政审结论”，后看高考分数。当年笔者的许多困惑，现在终于恍然大悟。李峻、吴铁生应属于“降格录用”。我们高三4班的俞乾、李适功课很好，父亲是右派，都没考上大学，他们应属于与钱元凯一样，“政审”为“不宜录取”。如屈大同讲话“考出大天，也上不了大学。”当年这种秘密“政审”遍及全国所有高中，从1957年至1965年不知坑害、耽误了多少青年人！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造成了多大损害！这一史实，应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记录，载入史册，永远铭记。

前面讲到的在运动中被撤换团支书的高三6班校友高艳华（现名高峰），文革后在香港告诉了我一件他高中毕业时的怪事。毕业生填写报考上大学的志愿表格之前，各班班主任会与本班学生一个一个进行交流，对同学们的报考志愿提出参考意见。特殊情况由教导主任出面谈话。高峰回忆说，他当时第一志愿是报考外语学院。学校教导主任屈大同找他谈话，说“你不要报外语学院了，外语学院要求政治条件高。你可报北大，北大是综合大学，有统战性质。”于是高峰报了北大，并考上了北大。他大学毕业后，经部队农场锻炼后，被分配去了保密级很高的省广播局，作了省电视台的记者。高峰回忆此事说“真好笑啊！北大成了统战学校，我成了统战对象。其实我的家庭出身不过是个小商贩即城市贫民而已。”当时的阶级分析法与阶级路线在四中已贯彻到如此极左和细致的程度。

高峰说他们高三6班有六个同学没考上大学，学习成绩都很优秀，但都因家庭出身没被大学录取。文革后恢复高考，他们都再报考大学，或直接读研，并在事业上都取得很大成就。像欧阳白、文棣、卢存伟等同学，都可謂自强不息的佼佼者。

文革后，有一天任小彬接到四中高干子弟校友电话，约他参加四中校友“红二代”聚会，被任小彬拒绝，任说“又搞高干子弟高人一等这一套，我不参加！”四中65届高三2班校友多次聚会，任小彬逢会就道歉，同学们纷纷说“又来了，又来了。你有完没完？”大家早已相互谅解。同学们相逢一笑泯恩仇，笑谈暴风雨，互祝夕阳好。

2016年4月16日，在北京，笔者与四中同班好友于火，约会了三个高干子弟校友：苏承德、任小彬、宋扬之进行采访。苏是当年四中学潮的核心小组成员，任、宋是较大范围核心圈的成员。大家应笔者之邀，回忆、反思当年北京四中的学潮与社教。于火是当年校团委委员，是学校团组织的最高层级；笔者是学生会军体部长，选举那届学生会是最高票当选。但笔者与于火都不属于班里核心小组成员（何论全校）。于火虽是干部子弟，但高干子弟圈传说于火“右倾”，可能是班里夺权的新团支书刘安东的看法，刘安东不同意于火参加班的核心小组。笔者是因为家庭问题，父亲是右派。因此我们二人对当年四中的学潮与社教内幕了解不多，苏承德等三人详细回忆、讲述了当年的许多内幕。

苏承德曾于2005年一次四中校友返校欢聚的大会上，在大会会场站起来发言，向当年曾受到冲击的学校领导刘铁岭、屈大同道歉。（当年高干子弟给北京市委的告状信，曾点名批评副校长刘铁岭和教导主任屈大同。）苏一讲完，屈大同老师马上站起来说：“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以后不要再提了。”师生们为二人的发言热烈鼓掌。

苏承德在我们五位校友聚会时说：“当时推动我们高干子弟搞运动，搞社教，主要有几种思想：一是阶级斗争观，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开展阶级斗争；二是接班人观，当时片面理解了中央关于培养接班人的指示，认为革命后代首先要负起接班的责任，当革命接班人；三是反修防修观，既要反苏修，也要反中国的修正主义，首先要破除学校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这么几种思想的推动下，出于责任感和优越感，觉得革军、革干

子弟有责任要搞阶级斗争；认为自己出身革命家庭，是当然的接班人，干革命，舍我其谁？”

苏承德说：“反思当年的事，在四中的学潮和后来的社教中，四中高干子弟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就是红卫兵运动的预演。高干子弟的优越感后来发展成血统论对联。四中高干子弟打破班级界线的小组织活动则正是后来红卫兵组织的雏形。开展阶级斗争，批判领导、老师，学生斗学生，抄家，后来红卫兵干的事，那时在四中已经露头，开始出现了。”

苏承德的反思告诉人们：文革确实发生在文革之前。四中的学潮与社教是文革红卫兵运动的序幕与预演。

四中当年的高三学生，平均年龄十七、八岁。上小学一般是在六、七岁时，从 1952 年前后入小学至 1964 年上到高三，从开始懂事到步入青春期，他们是真正在红旗下长大的一代。小学、中学的十二年教育，给他们灌输了些什么？对人性造成了什么影响？从四中的学潮与社教中，人们可以窥见到一、二。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在文革之初被老红卫兵打死，恐怕不能把账仅仅算到宋彬彬几个红卫兵身上。■

2016 年 7 月 21 日

美国德州奥斯汀

【考 证】

《戚本禹回忆录》指谬（一）

余汝信

一、我与戚本禹的交往

笔者本世纪初即认识戚本禹。2003年首次对其访谈，并征得其同意作了笔录，写成《与戚本禹面对面》，翌年1月首发于加拿大华人电子杂志《枫华园》。因为是较早公开披露戚恢复公民权后状况的文章，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初次见面，对戚印象尚好，为此，笔者予其“为人倜傥大度”的评语。但《与戚本禹面对面》文中亦暗示了笔者当时所能感觉到的与戚的思想差距：“以上有关毛、江个人品格的观点，戚声言为其本人近距离观感，余未予置评。而至于毛、江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的治国理念及因此给国人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余虽感同身受，惟因时间关系，未及与戚展开讨论。话题转入了一些戚当年经历过的事件。”

此后，笔者又见过戚多次，感觉戚随着年华逝去，“回到文革”的思维却愈渐强烈。到了2011年3月，笔者因事到沪，戚到笔者下榻的酒店见面。那一次，戚对笔者说，他想用两三个月时间，找两三人，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进行回忆录的口述、整理工作。言下之意，希望笔者能够协助。事出突然，笔者称需考虑一下再答复他。当时主要顾虑两个因素：一是时间上他太乐观，没有两年时间搞不出来；二是观念上的分歧。他是彻底的维护文革派，笔者则是否定文革派，估计完全不能磨合，况且他的思想倾向必然会极大地影响回忆录的准确性。故此，笔者一直没有正面回复他。很快，我得知他找到别人帮他运作此事，再后来，还知道他为此花了超过四年的时间。

虽则如此，但还是一直与他保持着朋友关系。2014年初，有朋友托我将出版戚著《评

李秀成》所用的李秀成自述影印件带还给戚，我照办了。不料同年10月戚来信问我此物是否还在我处，我心想，戚的记忆力怎么衰退到如此地步！今年1月，戚吩咐出版人将他回忆录稿的其中两章交我过目，阅后我明确表示大失所望，必须推倒重来。后有朋友传话说，戚承认这两章都是别人代笔的。

三个多月后，戚去世，他的回忆录还是出版了。这里头，到底有多少是他本人整理的，又有多少是别人代笔的，我们无从知道，也无需知道。我们只需要判断它的内容离真实的历史有没有距离、有多大的距离就可以了。

戚在回忆录后记中称，“《回忆录》是留给历史的我的最后作品。《回忆录》中表明我的立场、我的观点、我的价值取向是鲜明的，读者看后都会了然。但我更看重我在《回忆录》中描述的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史料的真伪应是研究历史的人最为看重的。我对《回忆录》中我描述的历史事实的真实性负责。但大家知道的原因，我已没有查证档案材料的条件，和访谈其他相关当事人的能力，仅凭记忆，难免有不准确、不完整，或是遗漏的地方。如有不妥、错误之处，请知情人指正。但我更希望将来文革档案的解冻与公开，能有相关的档案材料，佐证我《回忆录》中描述的全部事件与事实的客观性与真实性。我相信有一天，即使不同意我的立场、观点的朋友，也会承认我说的那些事都是真的。”

诚然，不少档案资料特别是文革的档案资料至今未能公布于众，给研究工作带来困难。但当今世界，是信息爆炸的时代，凭借今天我们所掌握的材料，已就可以对戚回忆录的大部分内容进行检验，以观察它究竟有多大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是会给澄清历史真相带来帮助，还是给文革史研究帮倒忙？

对《戚本禹回忆录》的评论，议题本来可以很广泛。但窥一斑而知全豹，举一反三，指出要害即可，似不必面面俱到。故此，下文仅重点讨论该书第二、三章的若干主要问题以及第十五章的张霖之问题。

二、关于毛泽东批评彭真

1. 彭真指责上海

戚文：1966年3月，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受张春桥委托，到北京来办事。他见到许立群的时候，许立群对他说，姚文元文章，你们上海没有经过中央讨论就发表了，连个招呼也没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杨永直回上海后，就把北京的批评向张春桥汇报了，春桥又报告了主席。¹

指谬：这一段话并非戚的原创，而是从“五一六通知”附件二《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以下简称《大事记》）脱胎而来。《大事记》载王年一选编、以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名义于1988年出版的《“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不难查到。戚对《大事记》原文作了改动，内涵与原意已大不相同。

《大事记》原文是：

许立群同志向彭真同志汇报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同志请示“学阀”是否有所指，彭真同志叫许立群同志给杨永直同志打电话，就说我彭真说的：第一，学阀没有具体指是什么人，是阿Q，谁头上有疮疤就是谁。第二，问上海发姚文元文章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个招呼。在讲这两点的时候，彭真同志又怒气冲冲地说，上海市委的党性那里去了！

将《大事记》与戚文相比照，最大的差别是“上海市委的党性那里去了”等对上海市委的批评，是彭真说的，不是许立群说的，许立群充其量只是传达彭真的话。共产党其实也是很讲等级的，什么级别说什么话，不可逾越。中宣部与上海市委平级，作为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没有资格指责上海市委，只有彭真这一级别的，才有可能这样做。戚也在“中央”层面呆过几天，怎么不懂这个道理？

近年官方出版的《彭真年谱》，与大事记的说法基本一致：

3月11日 晚，许立群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来北京询问“二月提纲”中

¹ 《戚本禹回忆录》下，页370。

说的“学阀”何所指的情况向彭真作了汇报。在电话中告许立群：第一，没有具体指是什么人，是阿Q，谁头上有疮疤就是谁。第二，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文章，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招呼，也不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通气？上海市委的党性哪里去了？许立群将彭真的答复用电话转告了杨永直。¹

2. 毛泽东建议出小册子

戚文：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北京不加理会，拒绝转载。为打破封锁，毛主席建议上海新华书店出版小册子，向全国征订。北京只订了几本样书，又不发行。²

指谬：新华书店只有图书发行权，没有出版权。更重要的是，北京同意订购姚文元单行本后，不是“只订了几本样书，又不发行”，而是订了五千本³。

“五一六通知”附件二《大事记》的说法自然比戚文准确得多：

十一月十一日至二十八日

北京各报刊，在十八天内，都未转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各报刊多次请示是否可以转载，彭真同志和中宣部都不转载。彭真同志还在许多场合，责备上海市委发表姚文元同志文章不打招呼，“党性到那里去了”。

姚文发表后，《北京日报》社长范瑾同志曾两次询问《文汇报》负责同志，摸姚文元文章的“背景”。

十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

上海市委因北京各报都不转载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即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将姚文印成单行本。二十四日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新华书店征求订购数字，大多数地方都有复电。北京新华书店奉命不复，电话询问也不表示意见，直到二十九日，才复电同意。

3. 康生传达毛谈话精神

戚文：1966年3月28日、29日，毛主席在上海同康生谈话。3月30日下午，毛主席

¹ 《彭真传》编写组：《彭真年谱》第四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8月版，页472-473。

² 《戚本禹回忆录》下，页370-371。

³ 《彭真传》编写组：《彭真年谱》第四卷，页448。

同康生、赵毅敏、魏文伯、张春桥、江青等谈话。在谈话中，毛主席对“二月提纲”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提出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阎王”指的就是中宣部以及背后主使的彭真等人，“小鬼”就是指关锋和我一些人。

3月31日康生奉主席之命回到北京。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在会上由康生传达毛主席在上海的谈话精神。康生说，主席说，北京写了那么多文章都不请示他。为什么姚文元写一篇文章就一定要请示他们呢？是我代表中央？还是你北京市委代表中央？¹

指谬：首先，毛与康生等人谈话大意，戚文做了改动，如彭真是说应“跟中宣部打招呼”而非“请示”；毛也没有说过“是我代表中央？还是你北京市委代表中央？”准确的表述，看看“五一六通知”附件二《大事记》即可：

三月二十八日至三月三十日

毛主席同康生同志谈了两次话，然后又同康生、赵毅敏、魏文伯、江青、张春桥等同志谈了一次话，批评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指出这个提纲是错误的。毛主席说，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做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毛主席指出，扣押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毛主席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毛主席要求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批评彭真同志、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对于三月十一日彭真同志叫许立群同志给杨永直同志打电话的问题，毛主席要彭真同志向上海市委道歉。

其次，康生回北京后，并无“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这回事。《大事记》称康

¹ 《戚本禹回忆录》下，页371。

生在两个场合传达了毛的指示：一是3月31日向周恩来、彭真单独作了传达；二是在4月9日至12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作了传达。

4. 中央书记处会议

戚文：这次会议，中央的一些重要领导人都出席了，我也列席了。就在这个会上，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决定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刘志坚任副组长，康生任顾问。¹

指谬：所谓“这次会议”，戚文称“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实际应为中央书记处会议。《大事记》称：

四月九日至十二日

邓小平同志主持书记处会议，周恩来同志参加。先由康生同志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然后，彭真同志作了几句形式主义的表态，夸耀他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反对毛主席，实际上却继续顽固地抗拒毛主席的批评。康生同志系统地批评了彭真同志在这次学术批判中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陈伯达同志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从政治路线方面批评了彭真同志的一系列严重错误。最后，周恩来同志和邓小平同志指出，彭真同志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的，是反对毛主席的。

这个会议决定：（一）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主席和政治局党委批准。

戚文的主要错误是：一、这次会议决定撤销“二月提纲”，还未有决定撤销五人小组，撤销五人小组是4月16日毛泽东在华东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才定下来的；二、根据戚本人的说法，他4月1日已从北京去了上海，4月中旬继续留在上海²，他怎么可能在此期间同时列席北京会议？再说，其时别说中央文革小组，连文件起草小组都尚未成立，戚以什么名义列席会议？

¹ 《戚本禹回忆录》下，页371。

² 《戚本禹回忆录》下，页375。

三、关于“五一六通知”

戚文：“五一六通知”的正式定名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因是在5月16日这一天的会议上通过的，所以后来一直被称为“五一六通知”。

在中央下发的正式文件里，主席在修改时所加进去的话，都用加粗的黑体字印刷。¹

指谬：作为当年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成员，戚本禹本来不应犯这样低级的错误。

“五一六通知”附件二《大事记》称，1966年4月24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基本上通过了中央的《通知》草稿，提交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通知》”。这就清楚表明，“五一六通知”的正式定名，仅就是《通知》两字。

关于“五一六通知”的定名，康生在1966年5月5日说过一段话：“顺便解释一下，这么重要的一份文件，叫《通知》好不好？我同伯达考虑过。少奇同志和陈总都考虑过，问主席，主席讲还是叫《通知》。”

此外，“在中央下发的正式文件里”，毛在修改时所加进去的话，并没有“都用加粗的黑体字印刷”。《通知》改名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及毛的修改处用黑体字，是1967年5月《通知》公开发表时的事。

四、关于设立中央文革小组的通知

戚文：中央文革小组的名单，最后是由出席会议的中央常委们开会商量决定的，在1966年5月2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闭幕大会上通过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后，1966年5月28日由中共中央向全党发了这个名单的通知：

《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

¹ 《戚本禹回忆录》下，页390。

中央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现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通知你们。¹

指谬：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将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及其名单以中发[66]281号中共中央文件通知至全国县团级以上党组织。该通知原文并无标题。《“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编者在将此文件编入时，自拟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这一标题而未加说明，未能核对原文的读者，很容易误认为这就是原来的标题。戚本禹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本应熟知这一文件，为何也犯了照抄《“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的错误？类似这样照搬的文字，本来应该注明出处，并加以一定分析，否则，好像这样炮制出这个标题的人错了，你也跟着错，还美名其为自己的“回忆”，也就露馅了。

五、关于戚与中央办公厅

以上种种，尚勉强可以归结为记忆错误，但戚有关他在中办任职的叙述，就不可以简单地归结为记忆问题了。

1. 关于中办秘书局

戚文：1966年5月1日，我回到了北京。过了五一节，我就去中南海找汪东兴报到。汪东兴向我传达了中央的决定，由我接替田家英的工作，这个时候田家英的事情还没有公开。后来总理把我找去，他对我说，中央决定在中南海成立秘书局，让童小鹏和我负责领导秘书局的工作。童小鹏主管机要处，让我主管信访处。²

指谬：田家英的问题暂且不表，关于中办秘书局，周恩来有没有对戚说过那些话，就大可存疑。

据童小鹏和其他知情人后来称，1966年6月初，中办机要室和秘书合并组成秘书局，调国务院副秘书长童小鹏任中办第一副主任兼秘书局局长，调国务院农办副主任曹幼民、

¹ 《戚本禹回忆录》下，页392。

² 《戚本禹回忆录》下，页382。

原机要室副主任赖奎、朱德原秘书曹全夫为副局长，戚本禹亦挂名为副局长¹。所以，“让童小鹏和我负责领导秘书局的工作”这样的话按道理周是不会说的，还有另外三个副局长不用干事吗？此外，其时秘书局机关下设文电处、秘书处、信访处、档案处、收发处等，偏偏就没有机要处²。周让童小鹏主管根本不存在的机要处，谁信？

2. “现在办公厅就咱俩了”？

戚文：我接替田家英的工作时，汪东兴对我说，现在办公厅就咱俩了，我水平不高，能管好警卫局就可以了。秘书局、机要局都归你管吧。我知道他是担心我分了他的权，就对他讲，汪主任，我在中央文革办公室已经分摊了你很多事情了。再说我还要忙着写文章，我连秘书室都管不过来。我怕他还不放心，就又跟他说，我这个人有个弱点，就是好名。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我写的文章能让主席看了满意。办公厅那么多事务，我实在没能力管，还是你来管。他看到我的态度很诚恳，也就表示接受了，没跟我再捉迷藏。³

指谬：这也是一段查无实据、颇多疑点的话。戚接替田家英，是在1966年5月中旬。当时，中央文革小组尚未正式成立，戚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局级干部。此前，除主任汪东兴外，中办的副主任有曾三、邓典桃、龚子荣、田家英、李质忠五人⁴。即使1966年5月田家英自杀、曾三受审查、龚子荣受批判，副主任在职的还有邓典桃、李质忠，还有大量与戚同级的局级干部，怎么会“现在办公厅就咱俩了”呢？况且5月份秘书局尚未成立，李质忠还兼机要局长，汪东兴怎么会说“秘书局、机要局都归你管吧”？到了6月，中办第一副主任兼秘书局童小鹏到任，7月副主任兼档案局局长杨青（原中南局组织部副部长）到任，8月中办政治部主任（相当于副主任级）王良恩（原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到任，那就更不会“现在办公厅就咱俩了”。既然此说并非事实，戚涉嫌编造这段话的目的何在？他不知道类似的谎言在一个海量信息时代是很容易被揭穿的吗？■

¹ 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二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1月版。

² 参见“老陈史海沉浮的博客”：《从机要室到秘书局——中南海纪事之十五》，2013年11月9日。

³ 《戚本禹回忆录》下，页389。

⁴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六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1月版，页68。

【考证】

《戚本禹回忆录》指谬（二）

——关于严慰冰匿名信案

余汝信

1、《戚本禹回忆录》关于严案侦破过程的说法

也许是为吸引读者眼球，《戚本禹回忆录》里有不少真假莫辨的中共高层内幕故事。陆定一夫人严慰冰给林彪一家写匿名信一案，就是其中之一。

关于此一中共当代历史上著名奇案的侦破过程，《戚本禹回忆录》称：

陆定一的问题是由他的夫人严慰冰写匿名信引发的。叶群曾把严慰冰写的一些匿名信拿来给我们看过。那些信写得真是下流得不堪入目，有些词汇是从《金瓶梅》的未删本上抄来的。……

叶群亲口跟我们讲了查处严慰冰的经过。那时有个友谊商店，里面有专给副总理以上的中央首长供应特需商品的。有一天，她们两个都去了友谊商店买特需商品。一个进去，一个出来，大概严慰冰买了很多东西，只顾看东西，没有看前面的人，叶群也是匆匆忙忙的，两个人就碰撞了一下。叶群说是严慰冰先骂她，什么贱女人、臭女人之类的话，骂得挺难听。她也来火了，就互相对骂起来。当时可能谁都没有认出对方，被人劝开后，各自走了。

严慰冰不甘心，走的时候，把叶群的车牌号码给记下了，然后就写信去举报。这封举报信，按照车牌号码，就转到林彪那里了。林彪的秘书收到信，就拿着去给叶群看，说有群众来信对你提了意见。叶群一看那笔迹，竟然跟寄给她匿名信上的笔迹一模一样。她马上去找谢富治，说，你们公安部查了那么多年都破不了案，现在好了，写匿名信的就是这个告我状的人，你们赶快找她去！谢富治马上

找来几位笔迹鉴定专家，一比对，专家一致认定，两个笔迹是出自同一个人之手。谢富治报告了总理。总理当即指示，立即逮捕严慰冰，专门立案审查。这一来，陆定一紧张了，他提出要去看看严慰冰。但没有总理的同意，谁也不能去看。陆定一就找谢富治，说要给她送点衣服之类的。谢富治表示很为难。陆定一就说我可以写封信给她吗？得到允许后，他就写了。信中说：我不知道你犯了什么错误，你要听党和政府的话，好好配合，力求宽大处理。我前段时间去无锡，给你买了块国产手表，是半钢的。你就看着手表，按时休息，按时起床，维护身体健康。

谢富治向康生报告了这个情况。康生果然厉害，他对谢富治说，你不懂上海话，他们两个都是南方人，都在上海住过，陆在信上所写的“半钢”就是上海话“半讲”的意思。那意思就是，陆定一叫严慰冰只讲一半，不要全讲。康生认为，因为事情已经败露，所以陆定一要严慰冰只讲自己的一半，而别讲他的。否则，他送表干什么？严慰冰手上也不是没有表。

谢富治向总理汇报的时候，说到半钢、“半讲”。总理听了也说，康生分析得对，可能就是这么一回事。¹

上述所谓“回忆”，包含了两层意思。前半段称，破案的关键是严慰冰“举报信”的笔迹暴露了自己；后半段称，严慰冰被捕后陆定一给她的信，由康生破解了其中深意。笔者认为，此两大段“回忆”，均非戚本禹原创，前半段是由《王光美访谈录》、后半段由《陆定一传》有关章节再作发挥、演绎而成。

2、戚本禹与黄峥的说法极度相似

戚称，“叶群亲口跟我们讲了查处严慰冰的经过”。惟笔者认为，此经过与2006年出版的《王光美访谈录》中黄峥的说法极度相似。黄峥如是说：

黄峥：这个匿名信案好多年都破不了。破案的过程很巧合。据说在1966年春

¹ 《戚本禹回忆录》下，页385-386。

天的一个下午，严慰冰、叶群都在王府井百货大楼出国人员服务部买东西。严慰冰同志眼睛近视，不小心踩了一个人的脚。那人大发脾气，口里不住地骂骂咧咧。两人吵了起来。严慰冰一看，原来那人是叶群。一气之下，严慰冰直奔军委总政治部，向总政负责同志反映叶群这种蛮横无理的态度。严慰冰是上海人，说话有口音，气头上说话又快。那位负责同志实在听不懂她的话。就要她把事情经过写一写。严慰冰就写了。事后，那位负责同志真的拿了严慰冰写的东西去向林彪反映。林彪、叶群一看，觉得这字面熟，就交给了公安部。公安部经过笔迹鉴定，确定严慰冰就是匿名信的作者。严慰冰于1966年4月正式逮捕，1967年2月送秦城监狱关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平反。至于严慰冰同志为什么要写匿名信，陆定一同志认为她是精神有毛病。陆定一同志说：“她本来没有精神病。1952年‘三反’‘五反’时，上面派人背着我在中宣部找‘大老虎’，他们企图把严慰冰和徐特立（当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儿媳打成‘大老虎’……这样的刺激，使严慰冰害了精神病。我去了一趟苏联回来，她经常与我吵架，后来又开始写匿名信骂林彪和叶群，信寄到林彪家里，有的寄给林彪本人，有的寄给叶群，有的寄给林豆豆。林彪到哪里，她就寄到哪里，5年时间写了几十封，并且都是背着我写的，我一点都不知道。”¹

以上所谓破案过程，黄峥含糊其词地用了“据说”的说法，并没有透露其信息来源。而且，这一说法虽然出现在《王光美访谈录》中，但显然是黄峥本人的自说自话，与王光美无关。戚本禹则不同，他大言不惭地声称破案过程是叶群亲口告诉他的。事情已过去了半个世纪，叶群早已不在人世，戚以为死无对证，他说什么，别人也奈何不了他。

3、笔者对黄峥的批评同样适用于戚本禹

对于黄峥上述“巧合”的破案过程的说法，笔者早在十年前《从王光美谈严慰冰案说

¹ 黄峥执笔：《王光美访谈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页394。

起》一文中已作过批评。现不厌其烦将其重录一遍如下。因为对黄峥的批评，原则上同样适用于对戚的所谓“回忆”：

1. 据可靠的知情人士透露，严案侦破的关键，是公安人员通过信件上的邮戳，分析了匿名信投寄的地点分布、时间密度及到达这些投寄点的路径，从而缩窄了隐藏甚深的嫌疑人的范围。绝非是黄峥所言的“巧合”。

2. 依据目前的公开资料，林彪至少自1965年下半年即在苏州休息养病。偶尔外出活动的范围，从未超出华东地区（1965年12月初到上海参加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及1966年2月20日视察济南军区），此期间，叶群除自1965年9月部分时间到江苏太仓参加““四清””及11月底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的一两天时间外，从未离开过林彪身边。直到1966年5月10日林彪在杭州陪同毛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之后，叶方随林回京（林参加刘少奇在京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整个1966年春天，叶群都在华东，如何又能在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现身？

3. 所谓“王府井百货大楼出国人员服务部”，即百货大楼的四楼七号房。对外用“出国人员服务部”名义，实际接待的除当时极为稀罕的个别公派出国人员外，平时主要服务对象为国家级领导人及其家属，即所谓“四副（党、国家副主席、副总理、副委员长）两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一元帅”。假设（仅仅是假设而已！）叶群那年春天果真在此间出现过，又岂能不知进来这里的是些什么人物？何以能为被人不小心踩了一脚就喋喋不休失了身份？再说，七号房内免不了遍布警卫及工作人员，岂会任由两位贵客吵骂而袖手旁观不加劝止？

4. 一个巴掌拍不响。退一万步说，两人果真吵了起来，你严慰冰就没有责任？据文革中群众组织的批判材料“揭发”，严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严“一次到‘黑七号’来，不报姓名，警卫人员不认识她，不准她上楼。这下子惹恼了这个‘部

长太太’，回去向旧市委大发脾气。旧市委赶紧向百货大楼挂电话，把警卫员训斥一顿。此后，……成了‘黑七号’的常客。她把‘黑七号’看成是自己的私有，什么地方她也要去，就连库房也要进去转几转”。¹群众组织的材料，未必可以全信。但空穴来风，事出有因，严之霸道及横蛮无理，不也就跃然纸上？！

5. 再退一万步说，假设两人果真吵了一架。这么一件芝麻绿豆小事，叶群也没有“仗势欺人”去中宣部告严，严怎么就非得要到总政去告叶？叶群不仅是主持军委工作的军委副主席的夫人，且更是中央常委、中央副主席的夫人，本人1965年已是军委办公厅党委常委，相当于军一级干部，且组织关系不归总政而属总参党委管理。谅你总政“负责同志”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去接纳严的投诉。

6. 又假设总政“那位负责同志”真的接纳了严的投诉。1966年春天，林彪远在离北京两千里之外的苏州，这位“负责同志”无论怎么认真负责，惟其是否“真的”可能因为这么一件屁大的事，专程从北京跑到苏州，“拿了严慰冰写的东西去向林彪反映”？叶群当时是“林彪同志办公室主任”，见林的一切事宜都得通过她（据知情者透露，即使在“四清”现场，叶群也要人架设了直线电话，可随时与苏州及北京联系），这位“负责同志”要代人告叶的状去见林彪，又如何通得过事无巨细都要管的“林办主任”本人这一关？

7. 据林办工作人员公开的说法，至少是自1960年代初以后，林彪自己从来不看文件，每天只是“听”不超过半小时的要事与文件摘要汇报。严慰冰的匿名信，家人及工作人员从未向林本人透露过半点风声，既然连文件都不看且又不知情，林怎么可能亲自看过匿名信，且“觉得这字面熟”？

如此说来，一言以蔽之，黄峥的“巧合”说引出的一番“破案”经过，纯属向壁虚构而已。²

¹ 首都彻底批判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经济联络站：《经济批判》，1967年4月28日。

² 余汝信：《从王光美谈严慰冰案说起》，首发于《华夏文摘增刊》第500期，2006年5月15日。

4、关于陆定一给严慰冰的信

戚本禹说，康生破解了严慰冰被捕后陆定一给严一封信中的“黑话”。事实上陆定一这封信并非是在严慰冰被捕后写的，而是在1966年3月7日严尚有人身自由的时候写的。这封信是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的陆定一是严慰冰写匿名信的同谋或主谋的“八大证据”之一。早于1999年出版的《陆定一传》如是说：

八、匿名信查出后，陆定一离京去到上海，连续给严慰冰写了三封信，用的是黑话，是与严订攻守同盟。

这里所谓“黑话”，是指3月7日他在上海写给严慰冰的信中的一段话：

“上海已能生产女用手表，今天拿了样子来看。男用的有四种：130元，防震防水防磁；110元，防震；100元，全钢；80元，半钢。女用的只有半钢，80元。我选了男用130元的一个，女用的80元一个。请他们挑选走得正确的，不必现在就拿货。这只女用表，算我给你的三八节礼物吧！”

这本是极平常的一封家信，然而却被当作“罪证”，并且加以荒谬的推测、歪曲、附会，说成是以送表为名搞密谋，许多话是“大有文章”的隐语，如其中“防震防水防磁”是告诉严慰冰男方（陆）将三防，女用选了“半钢”是暗示严“不讲”（无锡话“钢”与“讲”同音。“半”与“不”同音）。“挑选走得正确的，不必现在就拿货”，暗示严要选择恰当的话说，不要讲出事实真象。因此是统一口径，订攻守同盟，为翻案出谋划策。¹

至于《戚本禹回忆录》所述这封信与周恩来、康生、谢富治的关系尤其是康生“果然厉害”的分析，都是戚自己演绎的，没有事实依据。

5、严案早于1962年已经侦破

¹ 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12月版，页499-500。

根据文革中流传的群众组织的材料，严慰冰匿名信一案早已在1962年已经侦破，只不过对于严的处理一直拖延下来，直到1966年春中央才有所行动。1967年5月，首都红代会中国医科大学红旗公社等编印的《触目惊心的反革命案件——关于彭真、陆定一、钱信忠、黄树则策划反革命假会诊包庇现行反革命分子严慰冰的调查报告》称：“一九六二年，反革命分子严慰冰写反革命匿名信恶毒攻击林副主席的罪行，已为公安部门掌握。公安部派人找旧中宣部机关党委副书记赵俊和党委成员刘敏，对严慰冰的笔迹。”¹该《调查报告》又称，

1960年3月，严慰冰开始写匿名信。年底，陆定一带严去广州，找到当时出差在广州的上海华东医院院长薛邦祺说：严怀疑他，和他吵，要薛去看看。薛即将严的情况告之和他同到广州的上海精神病防治院院长粟宗华，要他以拜访为名，同去看严一次。粟去后，严正在楼上走来走去，陆不出面介绍严病情，也不让粟与严交谈，仅通过薛向粟介绍病史，薛对粟说：严慰冰吵得厉害，疑心，怀疑陆定一有外遇，吵得陆吃不消。粟据此和薛商量后，“诊断”严是“更年期精神病”。

陆定一要薛把严慰冰的情况向卫生部保健局写一报告。1961年3月2日，薛给卫生部保健局副局长黄树则写了报告称：“严慰冰近来在广州，健康情况不很好，经与粟宗华教授研究后，疑有更年期精神病，……陆部长叫我把病情和医疗意见告诉你。”

黄树则接到薛的信后，十分重视，马上给北京医院的许佩民大夫写了一封信：“我的意见，是请北京医学院脑系科沈渔邨大夫（笔者注：卫生部副部长钱信忠的夫人）给严慰冰诊视……。看之前，你可先把病情向她介绍一下。看时，我也拟参加。”沈看后认为严是“歇斯底里症”。

¹ 该调查报告由首都红代会中国医科大学红旗公社、健康报延安公社、卫生部机关红色造反团、卫生部机关红旗战斗团编印。文革中同类出版物还有《反革命“会诊”案件内幕——阴谋包庇攻击林彪同志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严慰冰反革命案件始末》（卫生部井冈山联合战斗兵团等编印）等。

1963年12月，陆定一带严慰冰到上海，再次找薛邦祺、栗宗华会诊，并用胰岛素休克办法，做了五十次治疗。陆这次见到薛后，“向薛很机密地透露了严慰冰攻击叶群同志的事”。随同陆定一夫妇到上海的，是陆的保健大夫耿德章，由他负责，把严治疗的情况向保健局汇报。

6、1966年严案处理前后的一些情况

据文革群众组织材料称：

1966年2月初，彭真打电话给钱信忠（1965年1月任卫生部部长），要钱安排陆定一住进北京医院。彭真在电话里问钱：“你知道他家里有什么事吗？”钱：“知道一点。”彭：“让陆定一住院去吧！严慰冰吵得厉害，陆定一在家里休息不了。”陆于2月6日住进了北京医院。

2月7日，陆定一找耿德章到他病房，谈及严慰冰蛮不讲理，始终对他怀疑，并谈及严曾向外面写了几封信去攻击别人，别人不了解，可能怀疑她有政治问题。她的病发展到最后，能有这种行为吗？你们给治疗一下吧。耿将陆定一的话向卫生部有关领导作了汇报。

2月8日，陆定一与彭真等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文化革命事宜。在武汉陆对秘书说：“以后严慰冰不适合接触机密文件，此事你不准告诉任何人，不准问为什么！”13日，陆返京又住进北京医院。当日，陆把中宣部副部长张子意叫到医院，对张说：“严慰冰写匿名信，咒骂林彪同志一家，”并说：“现在要处理这件事，”“据医生说，严慰冰害精神偏执症，要治疗，你看怎么办？”陆要张找严谈一次话，陆提出，“严或者去治疗，或者到农村参加‘四清’，或者到南京她姐姐家去。”

2月18日，由史书翰出面主持，在医疗处办公室为严慰冰组织会诊，严未到场，由沈渔邨、耿德章汇报病情，耿介绍说：“严慰冰主要疑心陆定一有外遇，

穿衣服上有没有香水都要注意。她在家里，常常对工作人员发脾气。陆住在北京医院，有一次护士叫留大便，在便盆上写了姓名，严看了大发脾气，吵到卫生部长那里去……。”该次“会诊”的诊断为“精神偏执症”。

2月20日，陆定一叫史书翰同去向彭真汇报。陆向彭双手作揖道：“严慰冰的事，靠大哥大嫂帮忙了。”其后，卫生部请粟宗华乘飞机到北京，参加为严的再次“会诊”。

2月22、23日，举行在京的第二次“会诊”。“会诊”仍不准见严本人，主要讨论诊断和治疗问题。“会诊”结论是“歇斯底里性格基础上产生的偏执状态”。在讨论治疗方案时沈渔邨首先提出，是否让她到下面参加“四清”去？并自告奋勇主动提出陪同严一块去“四清”。23日，史书翰向张子意作了通报。

3月5日，陆定一为避开严慰冰，离京到上海等地视察。

3月7日，张子意找严慰冰谈话，要他去“四清”或治病，严均拒绝。

3月11日晚，彭真打电话给张子意，叫他和许立群（中宣部副部长）到钓鱼台去。彭真拿出了严慰冰匿名信的照片给他们看，并指示安排严离开中南海。其后，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指名叫黄树则等到他那里，安对黄说，严慰冰是反革命，精神病是假的，并要黄给中央写一个关于为严会诊经过的报告。

根据安子文的指示，黄树则、史书翰授意北京医院总值班室主任力伯畏起草报告。报告共写了五稿，每稿均经黄、史亲笔修改，定稿后，又经钱信忠过目，最后由黄树则亲自送交安子文，安又转中央各负责人传阅。

4月28日，公安部会同中宣部将严慰冰隔离。具体经办人，是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和中宣部副部长张子意。两天后，4月30日，杨、张奉命从北京到陆定一正在逗留的安徽合肥，向其告之严案一事。5月8日，陆定一回京，随即被软禁。

6月27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通报、解释彭罗陆杨问题时谈及严案时称：“陆定一的问题。首先是从陆的老婆严慰冰反革命案件上

暴露的。严慰冰是严朴的女儿。严朴在大革命时期参加了革命，很早就离开了家，他家是个大地主。抗战时期，严朴的老婆带了女儿到延安找严朴，严朴没有见他们。严朴是个好同志，现在已经死了。严慰冰的反革命案件，二年前就发现了，当时我们怀疑陆定一是否知道她的反革命活动。这事是交给彭真去处理的，因为这是一个具体案件，我们没有直接去处理。两年以来，严慰冰的反革命活动越来越猖獗，她探听中央负责同志和林彪同志的行踪，林彪同志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住在哪里，这些事我们都不太清楚，但是她都打听得清清楚楚。严慰冰跟着陆定一，参与很多党内机密，知道很多事。几个月前，要彭真把严慰冰的材料告诉陆定一。而陆定一回去却把情况全部告诉了严慰冰，并用多种方法包庇严。最近已把严慰冰这个反革命分子逮捕了。根据各种材料判断，陆定一是知道严的情况，陆、严是合谋的，许多事陆定一如果不告诉严慰冰，严是无法知道。”¹

以上第五、六点引用的，均是文革期间群众组织出版的材料。笔者之所以引用以上材料，首先是要说明严慰冰案的真实破案过程，与戚本禹、黄峥的说法大相径庭；其次是要说明这些材料在文革期间曾大行其道，今天在一些地方的旧书市场上也可以购买得到，并非是什么要待官方解密的档案材料。以戚本禹的水平，为什么不可以引用这些具真实性的材料，反而去虚构一些街谈巷议类的、不着边际的故事？这是实在令人大惑不解的。■

¹ 内蒙古话剧团孺子牛、红旗战斗队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批判专集（1967年2月，上海），页103。

【评论】

毛时代的“黄金岁月”

——评《解放的悲剧：中国革命的历史，1945—57》

（英）李 劼¹

“解放”的谎言

熟悉现代中国历史的读者恐怕对任教香港大学历史学系的荷兰籍教授冯克（Frank Dikötter）并不陌生。冯克此前曾写过多本关于中华民国（1911—1949）的学术著作，包括《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和《开放时代：毛以前的中国》（The Age of Openness: China before Mao），等等。但直到在2010年发表了讲述大跃进的《毛的大饥荒：一段中国最具破坏性的灾难史，1958—62》（Mao's Great F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1958-62），冯克教授对毛泽东时代的人民中国（1949—1976）的思考和见解才逐渐为人所知。摆在面前的这本发表于2013年的力作《解放的悲剧：中国革命的历史，1945—57》（The Tragedy of Liberation: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45-57，以下简称《解放的悲剧》，引用只注页码），按照冯克教授的自述，是其人民三部曲（People's Trilogy）中的第一部。它的发表早于上面提到的第二部曲《毛的大饥荒》，而整个系列的最后一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著述也已在今年问世。

《解放的悲剧》的参考资料主要来自藏于大陆的档案。作者查阅了数以百计的文件，当中包括秘密的警察报告，未经删改的重要高层讲话，思想改造运动期间犯人的告白书，对农村造反情况的调查，对工厂和坊间的劳动条件的研究，普通市民所写的投诉信，等等。

¹ 李劼，加拿大华人，曾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就读。在定居加拿大期间，因工作原因，产生了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兴趣。后到香港工作，并发表过多篇有关中国历史著作的书评。现正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

其他的参考资料还包括个别人士的回忆录，书信，日记，以及当年这段历史的目击者的叙述（页 X I I I）。全书包含四大部份，共十四个章节，大致上按历史的发展顺序描写和分析了解放前的四年，解放后初期，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大跃进前的种种发人深省的真相。

为什么要研究这段似乎在很多中国人看来已经耳熟能详的历史？冯克教授在前言开宗明义地写道：“中国将其在 1949 年的胜利称为‘解放’。该词的确令人联想起当年走上街道欢庆重获自由的人群，但在中国这种所谓的解放和革命中，随之而来的并非和平，自由和公义。它实际上主要是由蓄谋的恐怖和有计划的暴力而构成的一部历史。”（页 I X）作者指出，1945 至 1949 年的国共内战令无数平民失去性命，而双方军队在对峙时的手法有时很残忍（页 I X）。在 1949 年后，暴力更是农村里的土改运动之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很多所谓的“地主”被清剿，其实这些人并不见得比其他的农村人口更富有（页 X）。按照作者的举例，当中的一些“地主”在土改过程中被活埋，捆绑，肢解，枪决或掐死，有些儿童甚至被当作“小地主”而被无辜屠杀（页 X）。

冯克在前言中进一步对《解放的悲剧》的写作意图作出解释，因为本书是关注发生在人民中间的悲剧故事，其与官方的宣传相去甚远：“官方宣传是致力于营造一个虚构的世界，与事实无关。它是计划，蓝图和模范，加上理想化的工人和农民，他们并无真实的血肉之躯。”（页 X I I I）至今确实有不少人对建国初期仍怀有罗曼蒂克般的印象，在这些入眼中，那是一段与后来的文革截然不同的黄金岁月。¹ 冯克的这本著作的意图就是要告诉读者，人民中国的首个十年也是一段为无数中国人民制造了悲欢离合的历史（页 X I I I）。现在让我们一起在冯克的引领下去重新审视这段历史。

“解放”的代价

当中国取得八年之久的抗日胜利（1937—1945），人民普遍渴望和平和宁静，但事与愿违，内战又悄悄展开了。作者在第一章“围城”的开始讲述了这样一段不为人知的真相：

一批长春的工人在 2006 年准备挖掘一条新的下水道系统时，意外地在现场发现了一堆可怕的人体残骸。当时他们中的一些人想到这些尸骨可能是二战时侵华日军的受害者，但无人知道其实在 1948 年内战时，红军围困了长春达五个月之久，造成城内的不少平民因此死于饥饿。事后红军把这些无辜者的遗体匆匆掩埋，没有留下任何墓碑和记号（页 3）。当时的长春大约有五十万的居民，而守城的国军则在这非常时期在全市内实施宵禁，居民在晚上八点至早上五点时不准外出。所有身体健康的男性都须按规定承担挖战壕的工作，违抗者有可能会被哨兵当场处决（页 4）。长春当时可说是一座孤岛，二十万名红军包围该市和切断了城内的地下水供应，并对其日夜不停地狂轰滥炸（页 5）。6 月 12 日蒋介石宣布撤消不准居民离开城市的禁令，即使如此，已经出逃的难民实际上不准再回城，因为市内根本不可能为他们提供生计（页 5）。另外，逃离的居民也要面对很大的困难：首先他们不准携带任何有价值的物件。其次，他们必须穿过一片无人地带，当中有不少土匪出没。难民想尽一切办法求生，例如将重要的财物包扎在一个麻布袋里，上面盖上骯脏的碎片和用尿浸泡过的衣服，希望借这难闻的味道来驱走抢劫者（页 5）。

在 6 月底时，大约有三万人被困在一个地方，在这里红军不让他们前进，而国军也禁止他们回城，摆在面前的只有死路一条。当时的死亡人数很多，横尸遍野，臭气熏天（页 6）。长春城内的情况不见得更好，因为粮食供应紧张，国军士兵不惜向平民下手，用手中的枪来抢劫老百姓的食物。士兵甚至把军队的马匹，猫狗，和小鸟都宰割，而平民则靠腐梁，玉米轴，昆虫，皮带，甚至人肉充饥（页 6）。但惨象还不止这些。因为无法忍受痛不欲生的境况，集体自杀是习以为常。一位幸存者在回忆饥荒发生时，记得他们连爬行的力量都没有了，而死去的人群中甚至有正在怀孕的女孩（页 6—7）。一位前人民解放军的副官曾如此评价长春之役：“长春就像广岛一样，伤亡人数相差无几。不同的是，广岛的灾难发生在九秒之内，而长春则是五个月。”（页 8）

在内战时，林彪所指挥的军队也令到另一个东北城市沈阳遭劫。他先是下令斩断北京和沈阳之间的铁路联系，为围城作准备。而当地的居民刹那间由约一百二十万人增至四百

万左右，因为难民和国军士兵为了逃避红军的追逐，而被迫自困于城中，但同时也有不少尝试逃出沈阳（页 20）。沈阳城里有很多年老体衰或穷困的居民无法逃生，则任凭命运摆布。当时正是 1948 年 2 月初，沈阳缺食物，缺燃料，也缺弹药。很多人因没有维生素补充人体所需而引致失明（页 20）。但更可悲的是孩子们，他们很多被坏疽炎，糙皮病，坏血病，和其他诸如此类的营养不良所消耗殆尽（页 20）。当时沈阳里的居民只是靠树皮，树叶，甚至街上的垃圾为生（页 20—21）。

当林彪主宰北方战场时，南方的红军在残忍程度上却毫不逊色。以其官方历史上一直引以自傲的淮海战役为例，红军与杜聿明带领的国军在徐州附近展开殊死争夺。战斗在乡郊是最触目惊心的，当地具有价值的古代护城河和城墙横遭破坏。人民解放军用地毯式轰炸，将他们经过的每一个村落夷为平地，而村民则流离失所，一位目击者曾坦言当时地上是横尸遍野（页 25）。

逃难的情景也让人闭目难眠。火车上难民和尸体并排，一些人因双手被冻坏而失足由车顶掉下路轨。幸存者或者成群挤在车厢里，或者紧紧爬在火车顶上才得以逃生（页 25—26）。在被围困下的徐州重演着一幕幕曾经在长春和沈阳上演过的悲剧：人民上街到处寻找食物；村落里的妇孺因无法逃生而被迫困在没有暖气的泥土茅舍中冻死；逃难的士兵一大批地塞在前往上海的飞机上，里面布满了他们血液和排泄物（页 26）。从 1948 年的长春之围到 1949 年 10 月 14 日广州沦陷，红军用前后一年左右的时间将整个中国解放了（页 32）。但这“解放”意味着什么？它是否真的能为中国人民带来幸福与和平？

“解放”下的奴役

国民党时代自 1945 年起便有户口注册制度，但人民中国在 1949 年后却将这套系统发扬光大（页 46—47）。首先，将粮食定量配给卡发给一家之主，工厂的经理，或寺院的方丈，这些人须承担责任向政府汇报各自所属户口的人口构成情况（页 47）。其次，国家也

对每个人的阶级成份和家庭背景作出了详细的分类，所有人都被划分为“红”与“黑”，“朋友”与“敌人”。不过这种划分非常可怕，因为一个人的一生可能由此被决定，例如一个小孩将来的社会地位和前途就是与他的家庭背景的好坏与否密切相关（页 47—48）。看来这一切与人口统计学无关，实质上是政权对人民在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全盘控制的最有效发明。

民国时期时尚的文化，现代、自由、和深受西方影响的生活方式，也在人民中国下消失得无影无踪。在上海等地，咖啡厅，舞会，赌场被一律取缔（页 60）。位于南京路的赛马场成了军营，夜生活逐渐式微，因为街上商铺都在傍晚六点打烊。逛夜街的人会被官员当场盘问，并要求查看住址证明和其他文件（页 61）。英语不再是国际间商务往来的语言，反而成了帝国主义剥削的象征。所有电报不准使用外语，街上的霓虹灯和广告上的文字要换成中文。在电影院和饮食场合，外文名字成了禁忌（页 61）。新闻自由成了一句空话。原本数百家的出版社所剩无几，而且它们只能发行同样的新闻。苏联的塔斯社则成了当时中国唯一了解外国的渠道。国家甚至不放过人们的衣着和个人品味，首饰，口红，和化妆被新政权认为是资产阶级和炫耀（页 62）。

新政最想对付的敌人是知识份子，其中包括那些在 1949 年时受建国理想吸引而放弃外国优裕条件归国的留学人士。人民中国不仅只是要求知识份子去再学习或调整其思想去适应新社会而已，他们对知识份子也是极度提防，因此竟然需要发动一场暴风骤雨式的社会运动来对知识份子和整个国家的精神领域进行打压和转型。通过冯克的描述，我们大致可以归纳新政所采取的几种方法以达致对思想世界的控制。首先，党员全面占领中国各个高校。书中一位当年的亲历其境者这样回忆：“有一天我们发现大学的党组织全面强化了，并来了一个新规定要求党员或共青团员需要驻守在每个食堂和每间学生宿舍之中。党员会记下每个学生的日常操守，甚至学生的梦呓都被记录和被考虑其中是否会有任何政治含义。”（页 181）其次，几乎每一个知识份子都被要求写出自我检讨，那其实是一种对人的精神的轮番折磨，因为那些所谓的“检讨”其实大多是对自己过去无中生有的“错误”

的交待，实质上是无理取闹，用以驯服知识份子。例如一些不肯服从和坚称自己无罪可认的老师往往被锁在房间里和受到干部的多次骚扰直到他们写出检讨书为止（页 182）。受虐的不仅是默默无名的人士，一些颇有威望的知识界精英也难逃被整肃的厄运（页 182）。毕业于美国伊利诺斯大学的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陈序经曾被要求站在岭南大学的一群师生面前进行长达四小时的忏悔，他当时已经痛哭流涕，但仍无法满足当权者的要求（页 182）。当时每一个人都被要求去诋毁别人，整个社会活在一种人为制造的极度恐惧的气氛之中。

按照本书的记述，人民中国对监禁和折磨犯人的过程叫作“劳动改造”，或简称“劳改”，劳改主要指犯人通过没完没了的学习和教育会议将自身进行改造的过程（页 243）。监狱条件之恶劣更是令人发指。在一个县城的牢房里，犯人睡觉的地方宽度很窄。在另一个地方，尽管当时既高温又潮湿，但犯人在很长的时间内竟然都不准进行梳洗和清洁。里面的环境过份恶劣，从而导致不少人死亡（页 244）。当时公安局的领导还拒绝为此而改善监房的条件，他的格言竟然是：“让犯人去死好过让犯人去逃。”（页 244）

在 1951 年春天时，国家为了减缓监狱里的人口压力而想出了让更多的犯人参与国家建设的想法，例如去建路和挖水库等等（页 245）。但对于在囚人士而言，这不是一种解脱，相反则是另一场灾难的开始。很多监犯在未到达工地时已然心力交瘁，在河北的一个盐矿，那里并没有足够的水和粮食，每月有不少人因感染痢疾或受冻而死亡。在四川，在铁路上工作的监犯们在隆冬季节甚至连外裤也不能穿着，而在广东的一个钨矿，因为无法忍受艰难的生活，有不少犯人自寻短见（页 246）。在当时的中国，很多在囚人士被定义为政治犯，但实际上这种定义多数情况下是无中生有（页 246）。按照作者的描述，因为案件的大量积压，法院胡乱判案，成千上万的无辜受害者被强行押进劳改营和被枪决，他们的家庭因此破碎，生命完全被摧毁（页 247）。除此之外，折磨犯人的方法也层出不穷，一些方式则抄袭中国古书，例如绑起犯人双手再将其倒挂，或者用砖头塞在犯人被捆绑的腿下，从而令到他们的身体不自然地扭曲，最终导致其膝盖崩裂（页 247）。

但照冯克看来，身体上的折磨往往比不上在精神上对犯人的侵害。思想改造即是永无

止境地要求犯人进行自我批判或对他们思想灌输。监犯必须互相检查，怀疑，和诋毁对方，有时候在斗争大会上，他们甚至被要求毒打那些可疑份子。用作者的话来话：“谁抗拒改造谁就要自杀，谁要想在改造中生存下来谁就要杀死自我。”（页 248）思想改造不仅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也是一种物质上的全权操控。在五十年代初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大专院校的师生都已经是国家的雇员。国家要求每个人都必须服从其的分配，无论这工作是好是坏。而国家所供应给每个人的食物的好与坏则是视乎于人民是否对国家的无条件的服从（页 184）。思想改造的内容还包括对大学进行院系重整，对民国时候已经建立起的一套以英美制度为基础的学术自由的风气清除得干干净净（页 184）。不仅知识份子的创造力遭受无情摧残，而且普通中国人民在思想和精神方面仅有的一点天赋人权也被横加践踏。首先是秦始皇时代焚书的景象又再成为现实。在上海和广东有不少书被当作是“封建残余”而被销毁和被当作废纸贱卖（页 190）。被当局允许流行市面的是那些来自苏联的俄语教材，毛泽东的著作，或其他官方用作宣传和洗脑之用的读物（页 191）。民国时代流传下来的西方国家的音乐，歌剧，和好莱坞的电影一一被禁（页 192—196）。而各种宗教及其信徒也无一幸免（页 196—206）。

人民中国在 1949 年后还有一个神话，即其农业集体化比在三十年代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来得温和，所造成的灾难也远比苏联少，但冯克在本书反驳了这说法。“通往奴役之路”一章中对人民中国早期的农业集体化的描述与斯大林时代苏联农村的悲剧惊人地相似，中国农民为了逃避自己的财产被无情夺走的命运，不惜“屠宰自己的牲畜，将家中的好马变卖回老马，把有橡胶胎的车轮换作古式的木轮。”（页 210）集体化不仅令农业受到破坏，而且也使到农村中的工业和其他行业无法幸免于难。在浙江一个比较富有的县，当地人原本有赖其特别的技术而令到这里的造纸业兴旺。但在解放一年之内，当地人竟然已变成了仅靠挖竹芽，刈草，和偷木为生（页 211）。

《解放的悲剧》还告诉我们，人民中国在 1949 年后不只是到了大跃进时才有饥荒，情况在 1953 年时已经很严重（页 212）。在当时的中国各地已有不少人在忍饥挨饿，更糟糕

的是，很多省份的父母因生活所迫而以自己的子女换粮食，村民则只能找树皮，树叶，树根，和泥土充饥（页 212）。农村导致的饥荒还令全国产生了一个问题，村民因逃避灾难而被迫四出逃生，令城市大受影响。在 1954 年 3 月，有不少农民涌进山东的首府济南。在大连港有人到此乞求驻守当地的苏联军队的帮助。在同年夏天的上海，每天都有农村难民坐火车到达（页 224）。政府为此在 1955 年的 6 月和 8 月分别推出了户口制度和按照户口人数定量供应粮食的方法去打击所谓的“盲流”（页 224—225）。但这高潮所造成的震荡并不仅限于农村，在 1956 年时，同样地中国城市里的工商业大多数已被国有化（页 238）。全国有不少私有企业主的资产被国家夺去，政府甚至对他们家中的锅盘和婴儿床也不放过，而这些人所得到的补偿则微不足道（页 241）。正如作者所言：“每个企业主都清楚，一旦他的财产被充公，他的整个人生便要从此完全受制于政府的反复无常。”（页 240）

“解放”下的暴力

在第四章里，冯克在此套用了中国作家周立波关于土改的同名小说《暴风骤雨》作为本章的标题，向我们展示了在解放后的农村土改的残酷。土改参考苏联的经验模式，先把所有农村居民按照其拥有财产的多寡划分为五类：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但其实大多数农民的生活水准基本上是一穷二白，相差无几（页 65）。然后便是要激起贫农和雇农们对那些所谓的地主和富农的深仇大恨，从而将阶级斗争推至极点。从一开始，政府的工作队力图说服贫农，富农的存在其实就是他们苦难的根源。在无数次的“诉苦”大会上，参与者都要求把自己个人的，其中也包括那些无中生有的，怨恨发泄在富农身上（页 66）。接下来政府便武装起那些一无所有的贫农，给予他们枪械，棍矛，和锄头用以惩罚富农（页 67）。被标签为阶级敌人的富农要在群众面前承受人们的辱骂，在斗争会上甚至要被肉体折磨和枪决。受害者的下场惨不忍睹。一位妇女被打得昏迷过去，她被抬进棺材，但不久被发现还未断气，但一位政府官员决定将她拖出棺材后再行处决。还有一些所谓的

“富农”因为要想方设法逃避迫害，而万不得已地躲在田里后被冻死（页 67）。

土改在中国南方更令人发指。在西南地区，政府的抄家队在搜索民居的粮食后，只留下少量的食物给那些劫后余生者。在四川，拒绝交出农作物的村民不仅要被体罚和上吊，有些人的眼睛更要被烟熏和鼻孔要被酒精灌注。一些怀孕中的妇女则被打得流产，而有些则整家人因无法再忍受苦难和逃避迫害而一起服毒自杀（页 76）。1952 年陶铸掌管广东，他此前曾经在邻近的广西土改中残酷地杀害了不少地主和“反革命份子”，人们因此把陶铸比喻为一辆横扫敌人的坦克（页 81）。自此，广东在陶铸领导下，“村村流血，户户斗争”成为管治口号，人们被无情地捆绑，悬梁上吊，和活埋（页 81）。

另外，土改也演变成了一场国民对中国民族文化和古老遗产的大破坏。在山东，那里的很多古董被无情地付之一炬或当作废物扔在碎纸堆里。在青岛附近的一个被认为是道教的发源地，一批流传自明清时代的珍贵的经文被弃如敝屣，而一些佛教的经典文稿更被当作卷烟纸。按照作者的引述，政府干部认为这些历史遗物都是“垃圾”和“迷信”（页 83）。

建国后不仅人民受苦，官员也难以逃脱厄运。在五十年代初期的三反五反运动中，虽然其目的是整治官僚们的腐败浪费和贪污行为，但如冯克所言：“毛利用他对整个中央机构的控制来定调和加强压力。如通常一样，他下达的指令是模糊的，所以他的手下只能靠揣测其真正的想法。从手握大权的部长到地方官，看起来每个人都是毛的目标。其时并没有法规严格界定何为腐败，何为浪费，这些类别定义广阔，可将从有意侵吞国家财产至微小的疏忽职守都包括在内。”（页 158）在毛泽东的鼓励下，全国成立了打虎队调查各地的贪污舞弊行为。打虎队为了达到捉拿罪犯的规定数额，不惜在假期中鼓动学生加入（页 159）。在当时的三反五反运动中，公开的批斗大会是家常便饭，而几乎每一个单位组织都成了批斗的战场。招供会在每一个政府办公室里皆随处可见，看似全国到处都是腐败（页 160）。在此次运动中折磨犯人时所采取的手法与前述的大同小异。在一个县里，犯人的头发不仅被扯落，而且他们的头还被强行插入厕所里。在石家庄，嫌疑犯被埋进雪地里，或被迫跪在热烫的灰烬上，或备受处决的恐吓（页 162）。

不仅是中国公民，而且在华的外籍人士在新政下也难逃厄运。对于人民中国而言，外国代表着入侵和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政府对当时的外国势力和事物简直恨之入骨。例如解放初期的外籍人士被毒打，侮辱，和不人道地对待的例子并不鲜见。外国记者的活动被禁，外籍人士不可随意迁徙，很多人受到官员的监视和滋扰，完全没有人身自由（页 110-111）。特别在 1950 年韩战发生后，因中国参战而令中美关系急转直下。至 1951 年 3 月为止，很多在华的美国公民因无中生有的指控而被关入牢房，与外界隔绝，所有美资都被冻结，美国在华企业也很快被中国政府全权控制。更多的外籍人士在离境前其个人财产皆被没收，有些时候甚至被拒绝离境（页 111-113）。

“解放”下的灭绝

1949 年的建国本来正是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国家百废待兴之时，但人民中国又立即介入另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乱之中（页 128）。中国的近邻，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北韓的领袖金日成一直以来都在酝酿发动战争入侵南韩，用武力去统一朝鲜半岛，此举得到了苏联领导斯大林的支持。但斯大林很狡猾，他既想看到北韓得到统一，又不想苏联介入战事，为的是避免有可能与西方发生直接军事冲突。所以当金日成亲身前往莫斯科向苏联寻求军事援助时，斯大林把这个包袱顺势推给了中国，他要金日成去找毛泽东帮忙（页 129）。而毛泽东需要斯大林支援其兼并台湾统一中国的大业，毛因此只能向金日成许诺，假如美国人在北韓的军事行动中介入的话，中国将会加入战事（页 129）。

尽管 1950 年开始的韩战令毛泽东声誉日隆，但他派往北韓参战的士兵却伤亡惨重。按照冯克给出的资料，北韓的冬天异常严寒，有时低至零下三十度。很多部队士兵只是穿戴薄棉拖鞋，有些甚至是赤脚参战，仅在上战场时打个布结便匆匆上阵（页 133）。有时整支部队会被冻死，而很多士兵的手足则被冻伤，或感染了战壕足病，有时导致坏疽（页 133）。战争的残酷还不止这些。当时的环境下，因为战场上的供给系统受到严重破坏，引致的饥

荒无处不在。军队中不少人因营养不良而变成夜盲，当时他们在很多情况下使用鸦片来舒缓因痢疾及其他疾病引起的痛楚（页 133）。最致命的恐怕不是身体上的痛苦，而是精神上的崩溃。中国的韩战士兵因极度疲劳而士气低落，有些人甚至自寻短见（页 133）。

但毛泽东并无退意，他还传令其军队要反击，从而令到战事一拖再拖，导致了更大的伤亡（页 133）。在北韩战场上，当时布满尸体，炮壳，和垃圾，但却缺水缺粮。有时士兵仅靠岩石间流出的水液解渴（页 135）。当年的一位参战的军官回忆其中的一个场面：

“那里大约有五十名伤员，他们完全没有得到任何药物和治疗。伤员躺在地上，有些则慢慢死去，无人理睬。在其中一个掩蔽洞里大约有超过二十具堆积一起的尸首。那些逃兵则被当场处决。”（页 135）作者认为尽管韩战代价高昂，而且当时政府内部对这场战争持怀疑态度的人不少，但毛一意孤行（页 135）。韩战仅是毛的个人胜利，却是中国的巨大灾难。

韩战的来临也成了毛泽东借此清除国内反对新政府的人士和加强铁腕统治的最好时机。而在开国之初至 1951 年 10 月止的一场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中，有不少人被杀（页 86）。按照毛的逻辑，根据每个地区的情况，全国的杀人定额应是每一千人之中取一人，但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却经常超出这个杀人定额（页 87）。毛认为数字只是一个指标而已，而更多人应该被杀，自此，有更多的省份竞争达到或超过了毛定下的杀人定额（页 88）。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干部为了达标而不惜制造无中生有的检控，从而令到更多的人被害。如作者所描述的，当时地方领导为了杀人达标，都争先恐后地与其他地方一起互相仿效和竞争，宁可错杀，不可放过，因为他们都怕被沦为“右派份子”（页 90）。所以有时那些正在被囚的监犯便成了牺牲品，官员宁愿节省时间和为了达标，不让其在监狱里呆太长时间而干脆一杀了之。正如书中引用的一位官员所言：“你必须去恨即使你没有恨意，你必须去杀即使你没有杀意。”（页 91）

政府的杀人方式也令人没齿难忘。例如在古城开封，枪决的时候先是射向受害者的头颅，后来又改为射向心脏。但有时枪的方向偏离，令到一些被处决者极度痛苦地扭曲在地

上，之后又不得不对其再度行刑（页 92）。公开行刑既是新政残害人民的标志，也是其用来杀一儆百的工具。一位在场人士回忆道：“我尤其记得当时一位工厂领班，因为其敲诈属下的金钱和引诱其中的一名女工而被判有罪。行刑的当天，他被推下月台。他因为双手被捆绑而在地滚动得离奇古怪。一位警卫当场枪击其头部，而我则只是离现场十步之遥。我看到了死者的脑浆飞溅，而他的躯体则难看地抽搐。”（页 95）在另外一个刑场，一位当年正被政府有意培养为干部的女性，因无法忍受行刑时的恐怖场面而尝试逃避，但立即被另一位干部拉回，强行扯住她的头部硬要她领略其中的血腥。她最后看到了全场的所有人在行刑过后都竟然踏着尸体而载歌载舞（页 96）。其中的一些受害者并非在公众场合，相反，是在森林，山峡，和河边，单个或集体地被处决。尸体在行刑后被埋在大坑里，但有些则被随地弃置而招致腐烂，死难者的家属往往要等很久才能找回其亲人的遗骸（页 93）。很多受害者的后代除了带着其前辈的罪名走完一生，还要承受社会的歧视（页 100-101）。一位身历其境的人这样写道：“在那个受迫害的年代，朋友与朋友互相背叛；家庭成员之间被迫互相告发。中国传统的礼仪廉耻顷刻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由此懂得朋友越多越危险，我们开始尝试到被人们所隔离和在强大的国家权力面前孤立无援的恐惧。”（页 101）看来无须等到文革，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和礼教已然在建国初期逐渐分崩离析。

《解放的悲剧》还破除了以往人们对建国初期所取得的经济和社会成就的迷信，例如以前普遍认为当时人们的生活水准和医疗卫生条件都比民国时期大为改善，但冯克对此不以为然，按照作者的说法，医疗保健并非全民公费，所谓的赤脚医生只是到了文革时期才出现（页 266）。而农民在解放前所享有的非政府式的医疗资源在一夜之间消失，各种宗教组织所创立的慈善团体在 1949 年后被迫关门大吉，而人民的身体状况则每况愈下（页 266-267）。更荒谬的是，政府的宣传竟然要求人们将健康看作是罪恶，不断散布奇怪的口号，例如“吃得太多米饭是一种浪费，匮乏是一种美德。”（页 270）当人们饥饿难耐时，则被告知用水充饥，因为“沸水含有卡路里”。这样便产生了很多因营养不良而导致的疾

病。政府对待患有严重身体疾病的弱势群体也是毫不留情。例如不少痲疯病人曾被干部所歧视，活埋，和焚烧而死，而孤儿，残疾和高龄人士也同样得不到新政的妥善照顾（页 272-273）。

“解放”下的反抗

作者在第十三章“事实背后”中写道：“时至 1956 年，人们在解放初期的很多希望都烟飞灰灭。政权并没有尊重民意，相反，他们只是把人民看成白纸上的数字而已，是一种有待政权去剥削的资源……除了官员之外的每个人，他们都要勒紧裤带去追求乌托邦。中国已变成了一个沸腾着不满的国家，社会上的张力正一触即发，扑向对政权的反抗。”（页 273—274）1956 年的时候，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刚刚逝世，新继任的苏共总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在当年 2 月的二十大会议上发表了令世人震惊的对斯大林的“鞭尸”报告，内容主要集中在揭露斯大林在位时的种种丑行。出乎赫鲁晓夫意料的是该报告竟然在整个社会主义世界中产生了动乱，可能更出乎赫鲁晓夫意料的是，他的二十大报告所招致的波兰和匈牙利的反苏联的暴动竟然会在东方的中国人民中产生回响，而封建时期的官逼民反在“解放”后的新中国又一次死灰复燃。

当时的中国人民尽管资讯相对闭塞，但当他们听到来自波兰和匈牙利的情况时竟然争相传播，包含此类消息的报纸显得洛阳纸贵，人们开始策划效仿匈牙利的模式来对抗政府的压迫（页 278）。中国在校的大学生首当其冲，在 1956 年的秋天时分，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有不少学生发起了超过一个月的示威抗议（页 278）。而当时的学潮不只限于南京，按作者的统计，至 1957 年初，全国已有不少学生武装起来反抗政权（页 278）。工人们也不甘示弱，不少人也走上街头示威，在上海的动乱甚至竟然由共青团的干部带头（页 278—279）。工人们的诉求其实大多与政治无关，他们无非是要求提高生活和工资待遇，但政府却将他们归类为反革命份子（页 279）。情况还蔓延到农村，反对集体化的浪潮在 1956 年

时达到高峰，人们要求对自己财产的控制权和可以选择离开集体农庄。在广东的顺德，村民强行拿回自己的土地并对前来阻止的干部用武力还击（页 279）。在浙江一带的县城，恼羞成怒的农民故意破坏集体农庄的资产，焚烧粮库，用刀威胁那些阻止他们离去的干部。而有些干部甚至同情农民的遭遇，他们觉得政府的某些农业政策比过去封建时代的剥削更可怕（页 279—280）。

在冯克的笔下，看来今天中国日以千计的平民上访可以在人民中国的早期已找到其渊源。很多村民因为不满现实，而走到北京的国务院抗议（页 280）。有一位带着四个婴儿的妇女，拿出一个写着“饥饿”的牌站在国务院的门口，按作者的话说：“这其实是一个对曾经向人们许诺将没有饥荒的政权的控诉。”（页 280）还有一位男人则在光天化日下点着灯笼向中南海进发，并要求与领导人见面，在作者眼里：“他这一毫不含糊的举动折射出新政正是笼罩着中国大地的黑暗的化身。”（页 280）上访的不单是农民，还有很多退伍军人，他们中的不少人被政府下放到农村中终其一生。他们在那里受尽艰辛，百病缠身，而政权对他们弃之不顾（页 280—281）。在 1956 和 1957 年的时候，中国退伍军人的愤怒终于火山爆发了。当中的很多人来到城市给当地官员施压，一些人更自己组织起来，策划发动游击战争。而一位来自受饥荒困扰的安徽的人士更扬言假如政府不给他们工作，他们就反抗到底（页 281）。新政对付暴乱自有其一套独到之处，那就是引蛇出洞式的双百运动和秋后算账式的反右斗争。

人们似乎对在 1957 年时发动“双百”时的承诺过于天真地相信，政府的鼓动一出，全国各地对政府的不满之声铺天盖地（页 286—289）。看完冯克的叙述，当时的情景很难不让人联想起民国初期的五四，学生和工人在“双百”期间带头反抗，他们甚至不惜以暴易暴（页 289）。在成都和青岛，学生们动手殴打官员和洗劫他们的办事处（页 289—290）。工人们在当年的游行反抗更令到全国不少地方的经济瘫痪，令到民国时期工人运动最高峰的三十年代也相形见绌（页 290）。但其后的反右斗争却是政府对所有参与示威的人们的总报复。在那场运动中，文革式的公开处决，互相揭发，和群众武斗提前亮相（页 292—

293)。根据作者的记述，政府对所谓“右派”的划分非常空泛和随便，很多官员为了完成上级交下的政治任务而对不少无辜者轻率地判处死刑（页 293—294）。冯克在《解放的悲剧》的最后一段中透露，虽然人民中国建立之初的几年里经历了不少严重的人祸，但毛泽东在这段时间里并没有处于主导地位。相反，他伺机以动，利用这几年为建立自己的无限权力王国铺路。毛的阴谋通过双百和反右成功了，他才得以在此后发动多场史无前例的导致更多生灵涂炭的人为大悲剧。这就是为什么冯克在本书开头所言的人民中国的早期几年并非人们一直以来幻想的“黄金时代”，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其实是此前悲剧的重演和延续。

全书总结

掩卷沉思，尽管本书的最大优点是史料翔实，冯克并不依赖于中国的官方资料，而是通过各种渠道找到民间和私人档案进行参考。但其最大的不足之处也同样在于作者对资料的运用和行文叙述的方式。冯克在全书中大量引用了自己所掌握的一手资料来展示建国前后人民所经历的悲欢离合，但他所引用的档案有点过滥。有时候作者只是用档案里面的数据和文字来叙述历史，缺乏对档案的有效编排，整理和使用，而且在行文叙述中所呈现出来的某些恐怖和残忍的画面可能会令某些读者感到不安。另外，冯克在本书中的某些用词未免情绪化，这似乎与他作为一个老练和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历史学者的身份有些不符。原因可能是作者一直以来强烈的反共立场，这种立场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他的写作方式，对档案的分析，对这段历史的理解，和最后的结论。其次，本书过份侧重揭露和探讨毛泽东的责任，给人印象是在那段历史中的很多问题都似乎是由毛一手造成的。作者忽略了分析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领导人在其中的角色。最后，作者在全书中似乎认为内因是造成这段历史悲剧的主要来源，尽管他曾提及中苏关系和韩战，但未能深入讨论中国在 1949 年后的国际关系（尤其是与西方的关系）是否也对这段历史和当时中国的内政产生了一定

的影响。

我个人的看法是，冯克的这本著作在某种程度上可与张戎（Jung Chang）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Mao: The Unknown Story）作一对比。¹比较起张戎的书，尽管《解放的悲剧》在引用参考资料和写作的学术规范方面都比《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来得严谨，但两书在某些方面有相同之处，例如选择性使用档案和数据，立论的客观性不足，和对毛泽东的评价过于负面。此前曾有学者写过对张戎一书的全面评估，并推翻了其中的一些错误论断，²但直到目前西方学术界对冯克的作品不足之处还未有较深入的探讨。

本书的一个重大突破是其结论推翻了过往学界对这段历史的定论。西方学术界对人民中国前十年的历史研究到目前为止可说是方兴未艾，此前的一些有份量的著述几乎一致地认为人民中国的第一个十年，无论从各方面而言都是非常成功的。³冯克在本书中继承了其前著《开放时代：毛以前的中国》的观点，破除了以往人们一直以来的迷信，即“解放”后的人民中国无论在各方面都比之前的中华民国要好很多。如果说《开放时代》主要是通过阐述中华民国时代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开明和国际化来映衬出此后人民中国的闭塞和窒息，那么《解放的悲剧》则通过列举种种建国前后从1945年至1957年这段时间人民的遭遇，来说明这段历史所造成的悲剧不仅超出此前的民国时代，而且与1957年之后的大跃进和文革相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本书中所交待的一切悲剧不仅与其后的大跃进和文革一脉相承，而且也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里面所有关于新政权暴力手法的记录都可以说是其继承了世上首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遗训。苏联专权的方式自列宁时代便已成形，及至斯大林时期登峰造极。它的一套管理和内斗方式也继承在人民中国的身上。而新政在建国后至大跃进时为止，一直以来

¹ 1 参见 Jung Chang, *Mao: The Unknown Story* (London: Jonathan Cape, 2005). Mechthild Leutner, ed., *Rethinking China in the 1950s* (Münster: Lit, 2007)。

² 2 参见 Gregor Benton and Chun Lin, eds., *Was Mao Really a Monster? : The Academic Response to Chang and Halliday's Mao, the Unknown Story* (London: Routledge, 2010)。

³ 关于这方面的作品，参见 Jeremy Brown and Paul Pickowicz, eds., *Dilemmas of Victory: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Mechthild Leutner, ed., *Rethinking China in the 1950s* (Münster: Lit, 2007)。Maurice Meisner,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New York: Free Press, 1999)。

都是以苏俄为师，但对于毛泽东而言，他对苏联的精华学得不多，但对其糟粕则获益良多。众所周知，尽管在表面上阴奉阳违，但毛在私底下非常痛恨斯大林。但其实毛一生学得最多的正是斯大林的真传，《解放的悲剧》中的所有由新政制造的人间惨剧与斯大林时代下的苏联如出一辙，毛其实是斯大林和苏联的最优秀的学生。

另外，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种种劣行，例如秦朝的焚书坑儒和宋明理学对人们思想的禁锢和愚弄，似乎都可以在《解放的悲剧》里找到其蛛丝马迹。还有，人民中国的创立者毛泽东本身是一位出身于偏僻而闭塞的中国农村，成长后又未曾受过多少正规教育的人，中国人长期以来落后和愚昧的小农意识在他身上得到最入骨的体现。毛泽东的成长经历，以及他在取得政权后的所作所为，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另一位有着类似发迹史的中国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毛泽东和朱元璋都曾因自己的出身低微而受尽周遭世人的冷眼和嘲讽，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目睹了人世间的种种伪善，荒谬，疯狂，和残酷，并将这些无法无天的行为运用在其夺权的过程中。在他们皇袍加身和稳坐江山后，因为过去所经历的世态炎凉已对其人性作出了最大的扭曲，毛泽东和朱元璋则加倍地施暴政于民，以补偿自身曾遭受的不公。他们的这种病态心理不仅腐蚀其自身，也不幸地嫁祸于中国无辜的老百姓。可以这样说，人民中国的统治模式是集中国传统的糟粕，苏联的野蛮遗风，和毛泽东的病态人格为一体而创造出来的政权。

我个人认为，从另一方面而言，由人民中国成立至大跃进开始时的1958年的这段时间，从某种角度而言确实是1949年以来毛时代的“黄金岁月”。何出此言？我的观点是，从《解放的悲剧》一书中我们已经看出，新政在这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已彻底地将其政权植根于中国大地上，大跃进打后的岁月只是不断地对政权的加强和巩固而已。其次，共产主义的经济运作方式已在这段时间里建立起来，私有经济全面消失，国家成为全民最大也是唯一的雇主和剥削者。另外，新政通过不断在人民的精神层面上的洗脑，物质层面上的破坏，在这几年的时间里一劳永逸地把中国过去数千年文明中的美好元素，例如礼仪廉耻和对家庭与亲情的重视，抹去得一干二净。此后大跃进和文革对中国的再次肆虐充其量只是雪上加

霜而已，决定性的大破坏已在五十年代初一锤定音。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开国之初的这几年，新政已成功地将人们对其的恐惧和全社会之间互相仇恨这两种病态心理建立起来。这两种病态心理更成为毛泽东时代及其后历代领导层用于维系其统治的两大法宝，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政权的至今不倒不是由于其强大的国家监控机器，而是其对人民精神上的阉割。当国民连沉默的自由也被剥夺，政权便可以肆无忌惮地走在他们的身上从容地迈向长治久安。人民中国利用解放前后大概十年的时间内将其统治系统地扎根于中华大地上，如此高效率的“革命成就”的确是人类历史上的旷世奇迹。但这一奇迹也是以无数中国人民沉重的血泪代价换取，也可算是亘古未见，单就这点而言，这确实是一段令世人没齿难忘的“黄金岁月”。

最后，西方学术界曾有过优秀的著作对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专制政权进行比较和分析，例如谢拉·菲茨巴卓克（Sheila Fitzpatrick）和米切尔·盖耶（Michael Geyer）编辑的《极权主义以外：比较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Beyond Totalitarianism: Stalinism and Nazism Compared）。¹该书中的每位作者在不同的文章中将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和希特勒的纳粹德国进行各方面的对比，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人民生活。这种比较研究不仅让我们了解到不同专政的特点，而且也让我们懂得专制社会所赖以产生的不同历史土壤，从而有可能令人类在未来避免悲剧的重演。尽管冯克的人民三部曲可以说是一种尝试，他将毛泽东时代的三个阶段分别进行评估和重审，但现时学界仍然缺乏中外共产主义史的比较研究，例如对比人民中国和前苏联的建国初期或者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斯大林的大清洗时期。这是一个更具刺激性和难度更大的课题，我们将拭目以待。■

¹ 参见 Sheila Fitzpatrick and Michael Geyer, eds., *Beyond Totalitarianism: Stalinism and Nazism Compar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宇清谈画】

那些年我们是怎么画画的（三）

——“大跃进”年代的“美术乌托邦”

王宇清

说到宣传美术，“大跃进”时期的宣传画大概是一个不得不特别拉出来谈论的话题。长达三年的举国狂热运动中，美术界自然也是跃跃欲试不甘人后。

作为多年致力于中国现代年画、政治宣传画一类“张贴美术”搜集的资深收藏者，笔者的珍藏中，恰好有着相当数量以“大跃进”为内容的年画及宣传画收藏。这些珍贵的张贴美术出版物如今已价值不菲，且必将成为研究“大跃进”等近现代中国重要历史事件不可多得的美术文献资料。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路线提出后，执政党即发动了持续数年的“大跃进”运动。

现在回顾当年火爆一时的“大跃进美术”，其的确给人一种“画不惊人死不休”的感觉。“大跃进美术”的产生与特殊年代的文化氛围直接相关，作为与当时此起彼伏的“劳动竞赛”、“生产竞赛”遥相呼应的“美术竞赛”，其美术表达上有某种天马行空的狂野，这种以表达上的天马行空挑战想象力、表现力极限的作品，使观者说不清是癫狂还是豪迈。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在“大跃进”年代曾流行过这样一句著名的口号。口号中有种壮怀激烈的时代气息，但在这强烈浪漫主义色彩背后又有种挥之不去的浮夸感。华而不实而又矫情虚夸，正是此类“跃进美术”的最好注脚。

说到这里，必须特别说明一下，本文中的所谓“大跃进美术”主要由1958年前后几年中创作出版的年画与宣传画构成。假如抛开意识形态及时代政治的判断，单以艺术效果论之，其对夸张和古今新旧对比等表现手法的剽悍运用，其层出不穷的奇思异想，其穿透

时空的画面张力，确实表征着那个时代的狂妄虚夸在特殊情形下一次集中的美术喷发。

现在，笔者就将这“大跃进美术”略略分组，与大家一起来回顾并反思。

美术“助推”跃进：“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大跃进”运动，旨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例如，提出钢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翻一番，由335万吨达到1070万吨，1959年要比1958年再翻番，由1070万吨达到3000万吨。粮食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增产80%，由3900亿斤达到7000亿斤左右，1959年要比1958年增产50%，由7000亿斤左右达到10500亿斤。等等。

于是，宣传美术中，大量的，豪迈的，剽悍的各个战线中的“跃进”，纷纷涌现：



四条屏年画《丰产图》，画中所配之文字依次为：一块山药煮一锅；一颗玉米装一车；高粱杆上安电线；坐着花生过黄河。



年画《公社如巨龙，生产显威风》



年画《鼓足干劲争上游，东方跃进西方忧》

“大办”和“特办”

“大跃进”运动在建设上追求大规模，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全党全民“大办”、“特办”的口号，例如，大办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大办铁路，大办万头养猪场，大办万鸡山。在这样的目标和口号下，基本建设投资急剧膨胀。据载，在“大跃进”运动如火如荼的三年时间里，基建投资总额高达 1006 亿元，比“一五计划”时期基本建设总投资几乎高出一倍。积累率突然猛增，三年间平均每年积累率高达 39.1%。



年画《一幅“最新最美的画图”》



年画《降龙伏虎》



年画《乘风破浪，各显神通》



年画《鲤鱼跳龙门》年画《大兴水利，移山造海》年画《要高山低头河水让路》



年画《河北农村跃进图》



年画《河北农村跃进图》（主图之局部细节）



年画《大跃进万岁》



年画《人民公社万岁》



年画《迎春图》和《迎春图》主图之局部细节

传统“神话”PK 现代“神话”

“大跃进”时期，在一时意识形态的特殊需要之下，宣传美术曾极富戏剧性地热衷“古为今用”，即试图把传统的神话故事拿来与当时官方力推的大跃进式“新神话”进行对比，以对传统神话贬抑性的描绘，来衬托“大跃进”所谓“改天换地”的巨大威力和空前成就。

下面的两幅宣传年画，就是以这种“古今对比”产生的戏剧性张力来试图烘托“大跃进”伟大成就的。或可称得上是此类夸张作品中的经典例子。



年画《新游记》



年画《新游记》（局部之一）



年画《新游记》（局部之二）



年画《新游记》（局部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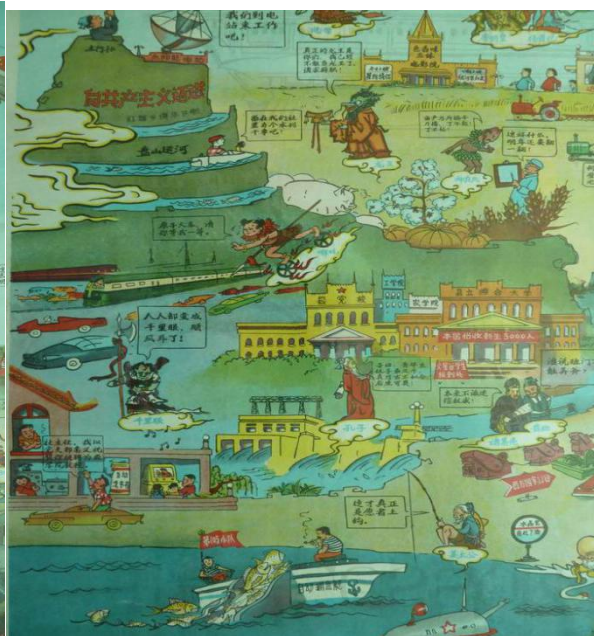


年画《群仙下凡参观记》

年画《群仙下凡参观记》（局部之一）



年画《群仙下凡参观记》（局部之二）



（局部之三）



年画《群仙下凡参观记》（局部之四）



年画《群仙下凡参观记》（局部之五）

【述 往】

死亡行军

——气象员邝浩泉之死

郭小林

1968年5月的一天，我正抱膝坐在托儿所的木地板上打瞌睡，门“吱呀”一声打开了，进来一个人，左手提行李卷，右手拎着网兜，里面是脸盆牙缸之类；身后是两名背着枪的“群众专政指挥部”的民兵。民兵们对他还算客气，没有推搡，只说了一句“老实呆着，好好反省！”就退出去将门锁上。我扶正眼镜，一看，这不是邝浩泉吗？他怎么也“进来”啦？

我感到奇怪的是，邝浩泉是气象站的气象员，而气象站是总场的直属单位，不归我所在的种畜站管辖（气象站虽然只有四个人，却与我们这个有六七百口人的种畜站平级，都是连级）。而且，人们都知道邝浩泉有精神病，对病人不是应当宽待吗？不过，“群众专政指挥部”的宗旨是抓的坏人越多就越革命、成绩就越大，当然不会“放过一个‘地富反坏右’”！何况，这里离总场十几里地，气象站在日常生活方面一向由种畜站代管（比如到井台打水、到食堂打饭、供电……等等），只要有“阶级敌人”，由他们“实行专政”似乎也说得过去。

邝浩泉两眼发直地愣在那里，直到有人说：小邝，你别傻站着了！坐呀！他才把东西放下，和我们一样坐在了木板上。

为什么关要关押在托儿所？因为运动一来，大家都不干活，也就不必往托儿所送孩子了，虽说每个月一个孩子只收两三块钱，但对于大多数老职工来说，仅靠每月工资32元（家属每月25元）维持一家四五口、甚至七八口人的生活，能省一点儿是一点儿。托儿所空下来，自然成了“群众专政指挥部”私设的临时看守所。

后来，我们几个曾被关押的人在一起开玩笑时就问：“你是什么学历？”或“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答曰：“托儿所毕业！”

“群众专政指挥部”从我们站六七百人中，最多的时候抓出二十几个“牛鬼蛇神”，男女老少都有。有的是因为“历史问题”，比如当过国民党兵；有的是出身问题，如地主、富农，乃至他们的子女；有的是因为“生活问题”，所谓乱搞男女关系；有的是因为“右派”；再就是像我这样的，是因为“炮轰派”。

邝浩泉是为什么被“专政”的呢？

邝浩泉是广东人、生年不详，按他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18岁从广东省气象学校毕业自愿报名来北大荒推算，应该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生人。对于他，人们所知很有限，大概知道一点也多属猜测。比如，听说他是孤儿，解放初期政府送他进的气象学校，所以他一心报效国家，得知北大荒招募气象人员，毕业就报名来了。

他个子不算高，一米七差点吧，但身材匀称，走路腰板挺得笔直；在气象学校练过哑铃之类，胳膊上很有些肌肉。相貌也并非典型的广东人诸如颧骨突出、眼窝较深，而是浓眉大眼，长得还是挺帅的。

1958年来到北大荒后，他立刻被广袤无垠的荒原景致征服了，夏季一直翻卷到天边的绿浪、冬天晶莹的冰雪世界，都令这个南国青年感到无比神奇。想到整个农场、甚至面积达一万平方公里的整个宝清县尚未建立一个气象站；想到他参与创建的气象站将填补全国气象站网的一个空白、成为国家气象台的一个点；想到他可以大显身手、可以开展气象科学领域的探索……他觉得幸福和骄傲，浑身充满了力量！干燥寒冷的气候和不习惯的北方生活算什么，能挡住青春刚健的脚步么！

然而，一切美好的憧憬还没开始，厄运就降临了。

获罪

1958年我们农场搞了个补打右派的运动，主要是针对“十万转业官兵”中的青年知识分子及各地来的青年学生中，嫌北大荒条件太艰苦、没有前途的人。总场宣传科的王立人，就是因为给朋友的信中说了些北大荒怎样荒凉、如何艰苦的话就被打成右派。运动中，气象站长，一个转业的前上尉军官，派邝浩泉去总场看大字报并回来汇报，邝看到大字报揭发有人说“毛主席的字写得像鸡爪子刨的……”，觉得稀奇，就向站里的人说了，站长因此向上面报告邝“扩散恶毒反动言论”，邝竟被打成右派！

那时气象站统共三个人，一个站长带着两个“兵”，一个是八一农大气象系毕业的，姓吴；一个是气象专科学校毕业的即邝浩泉。结果两个“兵”都被打成右派，超额完成任务。

这太不合情理！邝浩泉左思右想怎么也想不通——我一个十八岁的青年，对党只有感恩之心，怎么会反党呢？说我转述时不妥当、不慎重，可以批评教育，怎么说也是别人说的“错话”我奉命回单位转述……

邝浩泉自此神经失常。

其实，他患的也许是比较严重的抑郁症，民间常说的“文疯子”。他的病状不是哭闹打人那种躁狂型的，而是沉默寡言，不与人交流沟通，常常几个钟头站在一个地方发呆。不过邝浩泉还算是“幸运”的——由于缺乏专业气象人才，邝浩泉没有被押送劳改队服刑，留在气象站算是就地监督劳动改造，“戴罪”工作。

1960年他被下放到六分场去支援建设气象分站。和当地一个姑娘谈起了恋爱，后来姑娘得知他被打成右派而告吹，这个再次打击使得他病情更加重了——本来普通话就说不好，从此他更加沉默，沉默得就像北大荒的土地一样，无论心中有多少块垒、任凭蹄脚车辆的轧碾，它永远一声不吭……

然而，就像沉默的大地也有火山爆发一样，邝浩泉也会一个人跑到小树林里，，对着苍茫林海，寥廓天空啸歌……

“难友”

文革一起，八一农大的吴姓气象员率先“扯旗造反”，成立“鲁迅兵团”，人称“吴司令”，活动场所也就设在了气象站，参加者多是种畜站的知青等青年人，可是人数少得可怜，只有十二人，对立面不管是随大流还是怎么的，聚众七百，当然成了多数派并掌了权。“鲁迅兵团”遂投靠了总场的什么“红色造反团”，往上一直通到省里的“炮轰派”。邝浩泉向来不过问政治，哪一派也不参加，但整天在一旁听着，也受了影响，思想上倾向于“炮轰派”。

这与“右派”问题共同构成了邝浩泉被“抓”的理由。

很快这场闹剧就被上面叫停了。因为“东北农垦总局”系统总共抓了上万人“炮轰派”，多是文革前志愿来北大荒的城市青年。例如，我们农场 1963—1965 年三批北京知青中的活跃分子，几乎每个连队都被抓了几个，至少有二三百人吧。我作为“鲁迅兵团”的吹鼓手，写了很多大字报和攻击多数派的文章，说了很多过头话，很伤老职工们的感情，遂被当作“炮轰派”的骨干分子抓了起来，罪名是“三股妖风黑干将”（至今我连这“三股妖风”到底是哪三股也没搞清楚）和“炮轰派的黑笔杆子”。

1968 年 6 月，“东北农垦总局”改制成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数十万大城市的知青涌入兵团，这些中学生无论以前怎样，在兵团各级领导者看来大概都是“红卫兵”，都是一些无法无天的孙悟空一类的角色，他们的心里是恐惧戒备的，为了不刺激这些“革命小将”，兵团匆忙指示各师各团立即将被关押的文革前知青全部释放。我也算一个。不过种畜站的掌权者还是给我留了个尾巴：站里告诫那些新来的知青：郭小林是“内控人员”，你们不要理他，他有什么言行，你们要注意，要向站里汇报。

邝浩泉也很快放了出来，继续干那个观风测云的老本行去了，因团部某个部门发了话，毕竟那是一天不能离人的行业。而且也没有找出他这只“死老虎”有什么“反动言行”。

我和邝浩泉认识是在文革前我来种畜站不久。作为农场的连级单位，种畜站公费订阅

的报纸只有两份：《人民日报》及《东北农垦报》。我爱看报，发现气象站订了好几种报纸，特别是还有《参考消息》。每逢休息日，没事儿的时候，我就跑到气象站去看报纸。气象站好像从来不休息，总有一个人在值班，屋子里安静极了，只有收音机在用记录速度播放着什么“……八百百帕……六百百帕……”或是“温度露点差……”之类的气象专业术语，我也不懂。邝浩泉也从不言语，从不嫌我翻报纸的声音干扰了他。

但当我这个对社会懵然无知、初出校门的人，从旁人口中得知他的遭遇后，觉得真是匪夷所思——我曾经以为“有理走遍天下”，想不到真实生活中竟是这样“讲理”的！所以对他很同情，不过，他还是不和我交谈，不仅是我，他也从不和别人交谈，至今我还记得他沉郁的眼神——因为那次祸从口出的教训实在是太惨痛了！

“夭 殇”

到了1970年前后，邝浩泉已经三十多岁，经人介绍，找了个“二婚头”女子许某。许是江西人，已有一个儿子，而且脾气暴躁，只是一味向他要钱，有一次，嫌给的钱少，当着邝浩泉的面将钱撕碎丢进灶膛烧了。她来过北大荒几趟，看到条件这样艰苦，坚决不肯长住，邝浩泉只好请探亲假一趟趟往江西跑。许某给邝生了个儿子，竟不肯抚养，两岁就丢给了邝。为了保全这段婚姻，邝浩泉曾联系过许某家乡附近、江西一个小地方的气象站，想调去工作。但那里人地两生、语言不通，他熟悉的还是北大荒；再说不管怎样，他的青春、他的初恋、他的最早的憧憬，都与这片亘古荒原紧紧扭结在一起，他积累的气象数据全是我们的农场甚至是种畜站这个局部地区的，所以最后他还是带着孩子回到了这里。

邝浩泉一个人忙完工作又要忙家务，总算把孩子养大了；但他讷于言辞，又不懂如何管教孩子，儿子其实是在北大荒野大的，特别淘气。八九岁就敢躲藏进总场商店，半夜在里面胡折腾——据说那是个冬天，他趁下班时间，躲在棉门帘子里面，等到人家关灯锁门之后，夜深人静时，就在里面到处乱翻，吃饼干、喝汽水，还在旮旯拉了一泡屎……

对这样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公家也无计可施，只能是把这位失职的父亲叫到总场，训斥一番，赔偿损失，把孩子领走。

邝浩泉也没少打这孩子，有时候打得相当狠，邻居们都看不下去来劝，可是收效甚微，第二天又有小学校的老师来告状，说这孩子爬上学校房顶往下撒尿……

十二岁时，这孩子又添了一个新的“爱好”——在公路上扒车。

种畜站位于一个缓坡的高地，由总场通往宝清县城和雁窝岛的公路从中间穿过。由于上坡，卡车、跑运输的轮式拖拉机速度都很慢，这孩子灵巧得赛过猴子，等卡车气喘吁吁地爬坡时，他跟在车后边，紧跑几步就扒住卡车的后槽帮。他扒车的目的很单纯，一个是寻求刺激，一个是可以去比较远地方玩。司机们很讨厌这种行为，可是停下车去骂他、轰他下来，耽误时间不说，一转眼他又扒上后面的卡车了。

那天他扒上一辆带拖斗的卡车，上了拖斗以后，他还想到前面的卡车车厢里去，这时卡车已驶离坡道，车速已提起来了。这孩子作了一件非常危险的举动，他不是站到拖斗的三角形连接架上再去扒卡车车厢，而是站在拖斗的前槽帮上跳向卡车车厢，不知是卡车的颠簸还是向后的强烈气流阻碍了这一跳，他一下子掉到卡车与拖斗之间的路上，头部与路面剧烈撞击并遭拖斗的车轮碾压，虽经抢救还是死亡了。

这个孩子，还没有开始人生真正的旅程，就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的“死亡行军”。

儿子的早殇对中年得子的邝浩泉打击的沉重程度是无法估量的，他似乎一下子衰老了许多，两鬓也生出许多白发。虽然在儿子夭折前的1980年他已获得改正，恢复了原先的工资级别，笑容也久违地出现在他的脸上，但如今哀伤的眼神又代替了那短暂的快乐……

“死亡行军”

右派改正后，邝浩泉的精神渐趋平复，心思更加专注于气象科学的钻研，且一心想在气象学、在填补三江平原气象研究的空白上作出成绩。

种畜站的人们很少能够看到他的身影，他早出晚归，整天泡在气象站的数据堆里，很晚才回到自己那间简陋破烂的住房……

不幸的是，由于他的自闭，人们也无法更多关心他、了解他；他患有心脏病也没有人知道……

1990年春的一天，他迟迟没有去上班；气象站的同事感到不对劲，邝浩泉是非常敬业的，从来不曾迟到早退，更不会无故旷工。那时也没有电话，同事就跑到他的住房去找他，这才发现，他趴在他简陋的小桌上已死去多时，身下压着没有写完的《关于我场历年来冬季降水与来年土壤墒情之关系……》学术论文。

可见，那天他写学术论文直到深夜，心脏病发作也无人救助，如果发现及时其实是可以抢救过来的。

那年他刚过五十岁。

在他去世后，我曾找来钥匙，走进他的家，那是种畜站职工的标准住房：外屋隔成南北两个小间，南边的是门厅兼灶间，只有四五平方米大小，北屋是个六七平方米的小屋（邝就是在这里养猪），半间是能睡一人的炕；里屋大约十三四平方米，被邝浩泉自己打了个隔断，向阳的半间当作工作室，有一个用几块木板拼凑而成的简陋小桌，窗户上的玻璃很脏，经久未擦且多处破碎，用塑料布遮挡着，屋里光线昏暗，到处积满灰尘。朝北的里间有一铺炕，上面裸露的炕席有一半已经发黑炭化，显然是炕烧得太热烤糊的，剩下的部分也破烂不堪；炕上没有褥子，也没有被子、枕头，只有一堆乌黑的烂棉絮一样的东西，大概邝浩泉就是在这连狗窝都不如的地方睡觉的……

那是真正的“环堵萧然”、家徒四壁啊……

我怀着悲伤和歉仄掺杂的心情，在他睡觉的地方和衣躺了一夜，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减轻我的愧疚——我虽然自称是他的朋友，可是离开北大荒多年我却把他忘在脑后，极少与他联系；更没有想到他的后半生竟然遭受了这么多的困厄，他竟是这样生活的……

我的眼泪遏止不住地涌出，打湿了他那干燥已久的炕席……

毋庸讳言，邝浩泉有不良的生活习惯——他平反以后，虽然工资没有补发，但级别恢复了，收入多了，又是单身，大概是过去长期吃不到荤腥，所以特别爱吃肉。最后那几年他每年养一头猪，到过年的时候杀了，卖半扇，留半扇自己吃，从新年到春节，一两个月工夫，一百来斤肉全吃光了！这样，血脂的“三高”、各种疾病自然找上门来。

——在边疆的基层，确实谈不上什么精致的、高质量的生活，能吃饱就很不错，有肉吃就是最高享受，不要跟他们侈谈什么营养学、什么健康饮食。

他的死，一点儿都不轰轰烈烈，他默默无闻地来到北国边陲，又悄无声息地离去，那些论文就是邝浩泉最后的无声的歌啊！

一个土生土长的岭南人，从祖国南方、从热带来到祖国最北端的寒温带，人生地不熟的，他要克服多少地理上的、生理上的、生活习惯上的不适应！但是，这一腔热情、这报国的壮志，可有人珍惜？人们往往是不含恶意地嘲笑他蹩脚的发音，模仿他的广东话，有谁真正走入过他的内心世界……

尾 声

文革前，老职工曾告诉我，“三年困难时期”有一两个冬天，派给几个老职工的“活儿”就是赶着牛车，沿着公路收尸——那些刑满释放的右派走着走着就地一坐就死在那里了。

我听得毛骨悚然，却又半信半疑，直到我后来到老马号去养牛养马、早起放牧时，骑马经过北边小树林，真的看到了死人的白骨，才证实了这一点。

据老职工介绍，距离种畜站近百里的荒原深处，就是劳改队所在地，不知为什么一到冬季，就有劳改犯刑满被释放，但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可以让他们搭乘，偶尔有马车经过，车老板一看他们的装束，就知道是劳改犯，避之唯恐不及，怎么可能发慈悲捎他们一程呢！他们只好裹紧单薄破烂的衣衫，提着可怜的小包袱，在如同狼啸般的北风中、甚至是在漫

天狂卷的“大烟泡”中、在铺满冰雪的路上、一步一滑地踉跄前行。这一程近百里的路需要顶风冒雪步行十几个小时！实在走不动了，他们只得垫着小包袱在路边歇一歇，没想到这一歇就再也起不来了……

因为他们早已在超过强度一倍乃至数倍的体力劳动中严重透支了自己的身体；又由于狱方的克扣和低劣的伙食，长期处于饥饿状态，已经是“命若游丝”，这样的“死亡行军”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今天看来他们全都属于冤假错案，而且其中有许多各行各业非常优秀的人才、社会精英，就这样在年轻时、中年时横死边远的异乡，做了冤魂野鬼，灵魂不得归家，真是“死无葬身之地”！

老职工收了尸，用牛车运到北边小树林。但冬天地冻三尺，没法挖坑，起初还用炸药崩个坑，堆上一些冻土块草草掩埋，后来舍不得“浪费”炸药，索性往树林深处一扔了事。到了春天雪化，常常可以看到狼熊刨开土堆、啃食尸骨的痕迹……

虽然邝浩泉侥幸躲过这种劫难，但其实他从18岁戴上右派帽子的精神枷锁时，他的“死亡行军”就已经开始了，而在他刚满50岁的时候，这“行军”终于让他倒在他奋斗的路途中……

根据我场《场史》记载：一、1956年3月，铁道兵九师警卫连等部160余人带领3000余名劳改犯开始修建虎宝公路（三个月建成）。二、1957年3月，省公安厅同意我场对内称第三劳改队（有劳改犯2629名）。三、1963年6月，农场将劳改犯人和新生就业人员全部移交省公安厅。由此可见，真正最早开发建设我们农场、修建宝清至虎林公路的是这些人。■

2009年11月初稿

2016年6—7月重写

【述 往】

镇反纪实：我的劳改三十年（八）

——农工队阶段

王丕忠

评工分

刚调入农工队时，劳动、学习、纪律制度等方面虽与劳改队无大区别，但生活至少要好一些。每月每人发给十多元生活费，除去伙食费外，还可有几元剩余。不过衣着和日用品须自理。有人把多余的钱花在烟酒吃喝上，以致弄得衣衫褴褛。我把这几元钱完全用在购置日用品上，一点儿也不乱花。由于行动有了较大的自由，心情就比较舒畅。

可惜又是好景不长，烦人的事又发生了。农工队实行了包产和工分制度，工资制度随即取消。这种制度规定：小组的所得由各自的产值决定，各人所得由各自全年的工分多少计算，平时不发钱，只发给伙食费，每人总共能得多少需在年终结算后才知道。分值以小组全年净收益除以小组全体人员全年的工分总数得出。各人的工分在每天晚上就寝前评定，占用的时间即每晚的学习时间，因此学习也不学了。评分方式是自报公议。小组平均值每人每天是10分，全小组20人共计200分，这是每晚评出的总数，不许不足也不许超过。如果有一人被评为11分就意味着另有一人只能评为9分来对应。

这办法实际上不是按劳计酬，而是按劳分酬。因这酬是固定数，没有增减可能。有人多得必然要有人少得，有人少得才能有人多得。这办法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争夺。在实行后每晚评工分时经常为了1分半分争得面红耳赤，甚至动武，吵闹到队部。也常因少数人的工分评不下，闹到深更半夜。评分要想在熄灯就寝前完成几乎不可能。因此农工们弄得睡眠不足，精神不振，早晨起身，头昏脑胀，劳动不起劲，工效低落，很多任务不能按时完成。我当然也深受其苦，在繁重的劳动中，精力不济，昏昏沉沉，整天瞌睡。在以前粮食

定量时我曾盼望哪一天可让我吃饱一次，现在盼望哪一天可让我睡够一次。每晚评工分时我常一言不发，只是在举手表决时说一声“同意”，随别人去争争吵吵，我坐在一旁打瞌睡。轮到评我时我也不争，当然要吃一些亏，但我认为不值得去计较，还不如保养精神好。这种情况勉强维持到年终。

翌年春节过后由中队统计员和各小组的记分员共同核算，经过了三番五次的周折，账终于结算出来了。每人扣除预发的伙食费外，一般可得约30元，最多不超过40元，最少只10多元。我得到20多元，平均每月只有2元左右。这与大家原来所估计和盼望的每人至少可得100余元的数额相差很大，大为扫兴。平均亩产达400多市斤，工分分值却低到只有一分来钱，大家议论纷纷，表示怀疑。后来经管账目的人员把账目公布出来，原因是生产费用项目繁多，数额很大，从产值中扣除以后，纯收入所剩无几。这些帐是否可靠，没有一个人敢去追查。四类分子的帽子扣在头上，根本没有这种权利，谁都不敢轻举妄动。

到第二年度，评工分办法虽仍照旧，但评工分时间改为一星期评一次，定在每星期六晚上进行，因星期日休息不致影响出工。这样当然要比以前好得多。由于上年的分值极低，一分半分所值无几，大家对此也不那样重视了。评分时的争吵情况因而大大减少，以前那令人头痛的难关又算混过。

到了当年秋季，不知是什么原因，包产评工分，按工分计酬的办法取消了。据说这是刘少奇提出的办法，后来受到批判。随后，农工队又恢复了工资制度。工资级别主要分为两级，25元和31元，有个别劳动好的定为35元，特别差的人定为22元。我的工资先定为31元，后来降为25元，原因不明。但总的来讲情况好多了，每人收入都比包产时有所增加，尤其是不用每晚受评分的困扰了。

“四清”运动

有一年接近新年时天下大雪，两天两夜连绵不停，平地积雪过膝。继而寒流袭来，门

窗被震撼得直响，小土墙被吹倒，屋顶被刮掉。据说室外气温已降到摄氏零下三十多度。队部通知不出工，大家高兴之极。

第二天午饭后，队部通知开大会作冬训的动员报告。冬训每年都有，不过这次内容特殊，叫做“四清运动”。起初大家莫明其妙，不懂什么叫“四清运动”。经过上大课才知道所谓“四清”是指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和清思想。其实这四方面的问题主要是针对党员干部和工作人员的，与农工没有多大关系。因为一切情况在逮捕关押后经过多次审讯，坦白交代，以至在判刑后长期的观察和考验，已三番五次、不厌其详地搞清楚了，纵有未尽也无须搞大规模的运动。而且犯人在监禁中不可能参与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任何活动，有什么可清的？但是社会上搞什么运动，劳改队也要搞一通。

在这次运动中，大会小会不知开了多少次，到处贴满了标语，开会时不断高呼口号以张声势。队干部们常用要“大张旗鼓”和“雷厉风行”等名词来鼓励农工们积极响应各次运动的号召。“四清运动”进行时，每一小组有一名干部来监督和指导。进行方式是令每人逐一按这四个方面自报，经小组提出帮助后整出材料交由队部批准通过。进行中的先后名次由队部按所掌握的材料列出名单。问题少或小的人列在前，问题多或大的人列在后，按序进行，逐一通过，也称之为“解放”。对问题不能了结的人暂停进行，称为“挂起来”，让他考虑，作思想斗争，他的问题留后处理。

在运动开始以后，各小组电灯通宵不关，并派人彻夜看守，以防有人行凶、自杀或逃跑，气氛搞得恐怖紧张。我自幼一直是熄灯睡觉，已成习惯，通宵开着灯我睡不好，弄得每天头昏脑胀，很不好受。干部们还扬言，凡不坦白交代，把问题彻底弄清的人，夜里睡也不安，还会说梦话，把罪行透露出来。这种心理战术对别人不知怎样，反正对我是一点也没起作用，只觉得可笑而已。所谓问题主要是指逮捕前未交代清楚的余罪和逮捕后的反动言行，在这方面恐怕与社会上搞这次运动的方式有所不同。对我来说，判我徒刑根据的罪行在法律上都是不能成立的，更谈不上余罪。可是每人必须要过这个关，逃脱不了被逼、被斗、被侮辱的折磨。队部排出的小组名单中我名列第一。原因何在我也弄不懂，在进行

自报公议中只用了一天多时间便通过了。在小组坐镇的干部私底下谈话对我说：

“你已经解放了，在进行别人时你要大胆地帮助，批判要严厉，要上纲上线，要使会场气氛热烈，不可出现冷场，务必把运动搞深搞透。你已通过，别人不可能对你打击报复。”

没有经过多大周折我便被解放，心中一宽。不料那干部要我在运动中起积极作用，使我背上另一包袱。我知道这是劳改队中在批判斗争一个犯人时惯用的手法，即干部暗中布置所谓积极分子，在会场上开口骂人、动手打人、无中生有、强词夺理地逼被斗者承认没有干过的事。我对这“积极表现”非但不愿意而且鄙视。以前别人用这种方式对付过我，现在却要我去对付别人，真使我为难。我之所以被轻易通过，首先被轻易解放的原因，依我看是由于在运动开始之初，大家摸不清底细，不敢轻举妄动。那些不讲道义的人还没有想到利用这一机会来假公济私、打击报复、捏造事实、作伪证等来达到泄私愤、清夙怨以至借此表现自己、讨好干部等目的。到了后来这种情况便出现了，而且愈演愈烈，甚至通过一个人须经几昼夜的帮助斗争。而且有的人还通不过，挂起来。

这一运动进行了一个多月，时近春节，冬训结束，于是又转入劳动阶段。照队部的话说是“暂时停顿，以后还要彻底地搞”，事实上后来也没有再搞。被挂起来的人也就不了了之。想是当局知道这运动把四类分子作为对象没有多大意义，为了不多耽误劳动，就这样虎头蛇尾地结束了。外界情况我不了解，就我所知这次“四清运动”，在劳改队中伤人死人的情况还未听说。与以前的镇反、肃反、反右和以后的文革相比，远为逊色。

“三忠于”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开大会时干部在报告中指出，这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一场思想领域大革命，目的是为了加速进入共产主义。我暗想毛泽东真是天才，创举一个接一个，这文革规模之大、持续之久远远超过历次所有的政治运动。劳改犯人和农工队地处僻壤，远离城市，

与社会几乎隔绝。文革中，这里发生的事有些说起来真可笑，有些说起来真可怕，也许我的所见所闻并不典型，但这是我劳改生活中的又一段经历。

文革初期，我在白土岗大土堡中队，农工队干部为了阐明文革的意义和重要，不断召开大会。大队作报告，中队作指示，小组进行讨论。搞了一阵接一阵的学毛著的高潮。

“毛主席语录”又称“红宝书”，每人必备一本，绝对不允许弄脏弄破。其中“老三篇”每人必须背熟。所谓“老三篇”是“毛主席语录”小红本中最热门的三篇，即《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和《纪念白求恩》。语录中有若干条必须随口说出，不许说错一字。晚间学习时必须手捧语录端坐在炕上，不许靠墙，不许打瞌睡。

每人必须发言表态和谈学习心得体会，对照自己的言行进行自我批评和小组批评。这样搞队部还嫌不够，把每晚学习时间从两小时延长到三小时，以前两小时已很难熬，凭空又增加一小时，更加受罪。劳动了一整天，晚上已疲乏不堪，还要经受这三小时的精神折磨。我多年的经历告诉我上面的领导人唯恐人们安居乐业，过平安的日子，总要想方法来折腾人、磨难人，以至置人于死地。这是什么心理状态？是否属于虐待狂？令人难解。

随后不久花样又翻新，每天早上起床后，脸也未洗，立即集合站队，向毛主席像行三鞠躬礼，名为“向毛主席早请示”。接着唱革命歌曲，朗诵毛主席语录数则，然后才能洗脸开饭出工。晚上学习完毕，临睡前又要集体向毛泽东像三鞠躬，唱革命歌曲，并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名为向毛主席汇报。这早请示晚汇报的制度一直实行了多年，直到文革中期林彪事件后才停止。这种怪现象行之既久，大家也就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也感不到它的滑稽可笑了。

接着，更上一层楼，又兴起了新花样，进行“三忠于”活动。所谓“三忠于”是指“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和“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进行中各小组必须利用晚上学习时间各显神通，用各种方法布置各自的宿舍，可用文字、图画、诗歌、剪纸等种种方式来表达和体现“三忠于”。有的人还跳起“忠字舞”，至于唱“三忠于”的革命歌曲那就更普遍了。

我因略会写毛笔字，便被指派用彩色笔写“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十六个大字，贴在墙上。写这类东西必须十分小心，万一疏忽写错，将招致大祸。有一人把简体字的“庆”字写错，把内中的“大”字写成“犬”字，即说他是有意丑化共产党，受到批斗和处分。又有一人把简化字“国”字当中的“玉”写成“王”，忘了一个点，也受到批斗处分，说他是幻想封建王朝复辟。

又有一次墙上贴的剪纸中毛泽东的“毛”字的一勾没有贴住，挂了下来，有人提出“毛”字的腿掉下来了，贴剪纸的人也受到批斗和处分，说他是希望毛主席跛了腿站不住，共产党垮台。这只是很多事件中的几个例子。这些人除受到批斗和处分外，还把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列入专案，容后处理。

又有一次逢星期日休息，那时农工队和劳改队都实行“大礼拜”制，就是两个星期才休息一天。那天是大晴天，阳光灿烂，大家把多日未洗的衣物洗了晾出来，把院子中绳子、架子、树枝等都挂满了。我和小组中的另一人，麻痹大意，警惕性不高，把洗好的东西晾在屋外毛主席语录木牌上。有人汇报到队部，当晚我二人即受到严厉批斗和打骂。随着追究的深入，得知那另一人晾的是短裤和袜子，我晾的是帽子，这下便放宽了我，专整那另一人。这件事当然也列入专案，我为此久久忐忑不安，不知会导致什么后果。

有一天中队召集开会听报告。讲台上除中队干部外有一解放军战士，年龄约二十岁。经中队干部介绍，他是部队中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典范，今天请他来向大家介绍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要求大家仔细听讲。那战士态度温和，讲话很文雅，大概是学生出身。他开始讲时有些腼腆，随后就很从容自如了。讲的内容无非是陈词滥调，但还没有不通不当的话，说是很得体，只是平淡无奇而已。讲完后未等散会他就先走了。他走后指导员接着讲话，说那战士一天要到好几处去作报告，很忙。随即称赞那战士，说他学习毛主席著作怎样勤奋，体会怎样深刻，并介绍说他把“老三篇”学得烂熟，每篇有多少段、多少字，其中有多少个“的”字都能说得准确无误，这才叫做学深学透。你们行吗？你们确实应该向他学习。此后由队部号召，又掀起学习“老三篇”的新高潮，责令大家要背熟，并举行

测验。可是成绩不理想，能全部背出的人极少，哄了十几天后便沉寂下来。

学习毛著和“三忠于”搞了相当长时间后，文革进入了批斗阶段，实质上是恐怖阶段。

批斗运动

一开始大队召开大会作动员报告，传达上级指示和大批判进行的方式方法。中队扬言对犯罪和犯错误的人必须从严批斗，不能放松，不能草草了事，问题务必搞清楚搞彻底，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不能放过一个坏人。并领读了一段毛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由于这次大会的召开，又经中队干部的明指暗示，在进行批斗中不能文雅，不能专靠以理服人，必须同时以力服人，因此批斗的方式方法逐步变化、逐步升级。被批斗者从不许直立，必须低头哈腰以至下跪请罪。不久以后变本加厉，改为“坐飞机”、挂土坯，对质问的问题如不答或辩解，立即遭到拳打脚踢，甚至用柳条抽打。被斗者愈来愈受罪。

小组中的劳动组长、学习组长和靠拢政府的积极分子经过队部的指示、敦促并奖励充当批斗会的主角，除本人发淫威外还督促其他人也积极投入斗争。谁表现得不够积极，谁就犯了“好人主义”，同情落后，报到队部立案，存入个人档案，成为被斗争的依据材料。因此人人自危，不敢冷眼旁观，不得不装模作样地大声叫骂，动手动脚。

我有一次由于实在疲乏，在开斗争会时坐在炕上墙角打起盹来，发出的鼾声被人听到。这一下可不得了，立刻把我揪下炕，你推我搡地逼我坐飞机。正在这时学习结束的钟响了，大家急于就寝，才放过了我。第二天适逢大礼拜休息，没有开斗争会。星期一晚上再开会时大概是把我这件事忘了，没有人提起，继续又批斗原来那人，我因此逃过了难关。

还有一次我也几乎遭殃，我小组中有一姓章的农工，平时与我相处较好，是心地很善良的人。那次为什么批斗他我已记不起，积极分子把他打得很厉害。其时已到学习结束的

时候，我只说了一句：“好了，好了，明晚再说。”这下引起那打人的大怒，一把揪住我要打我。我一时火起不让他打，二人扭了起来。幸亏旁人并没有支持他，只是把我俩劝开了。第二天他告到队部，说我阻碍批斗，同情落后，我因此受到批评。学习组长暗中告诉我，由于这件事我已列入要被斗争的黑名单，如果当时没有到学习结束时间，我这问题要严重得多，肯定要立即被揪出来。

在整人批斗阶段中，总的来说，遭殃的人多数是善良软弱的人，那些凶恶奸诈的人反而很少被斗。原因很简单，由于他们厉害，别人不敢惹他们，怕事后受到报复。在这批斗阶段，人人自危，惶恐不安，幸而我所在的小组没有发生大事件。至于逼供打骂、挂土坯下跪、坐飞机等体罚和污辱人格等，在那个年代已不足为奇，没有人会联想到法制、人权这些不合时宜的东西，许多人根本就没有这些观念。

我们隔壁小组中有一被斗争的人说是由于态度顽固、死不认罪，一连整了一个多月，脸被打肿，腿被踢拐，衣服不整，面无人色，两眼直视，如痴呆状态。队部在他小组中指定两名身强力壮者睡在他两旁，日夜不离他左右，以防他逃跑、行凶或自杀。夜间斗他时，常听到他因被打或其它体罚大声惨叫。这人是个很耿直的人，不尚奸巧，不识时务，这就是他遭此厄运的原因。他与我较熟，我见到他这种处境很同情他，可是我自身难保，爱莫能助，心中十分难过。

另一小组中有两人被斗多日后被关进“小号”，即关禁闭。那几间“小号”是文革开始后不久新盖的砖屋，每间面积极小，只有约4平方公尺。只有门没有窗户，因为窗户不牢固，容易被破坏。室内没有电灯，怕引起火灾或自杀。门一关上屋内一片漆黑。那两人被关入以后，仍不断地被提出来大会批斗。他俩的案情据说很复杂，牵连多人，详情我没有弄清楚，也不敢去问。他俩被关入“小号”多日以后，有一天早上送饭的人开门发现一人躺在地上，昏迷不醒，另一人已上吊吊死。经调查，他俩把衬衣撕成布条，连接成带子一起上吊。一人吊死了，另一人没有断气，布带断了，摔了下来未死。据推测，他俩不愿检举同案，想自己一死了之，免得连累别人。这种情况当局常以“畏罪自杀”称之。

此外，其他小组还有几个人被五花大绑或带上手铐脚镣，由武装人员用卡车押走，什么原因连小组都不知道。估计是由于外界检举。这些人被押走之后，从此消息全无，不知去向，没有一个被押回来过，看来是凶多吉少。那一段时期全队陷入恐怖之中，人人提心吊胆，深怕被叫到姓名被抓走。有一农工家属，五十多岁的老太婆，由于受了刺激，神经发生了错乱。一听到卡车声便大声嚎叫，以为要来抓人，有时还边叫边在院子中乱跑。其声音凄厉，裂人心肺。

那时“内查外调”极频繁，当局不惜大量人力物力来大搞特搞。我这人社会关系不复杂，参与过的机构和组织极有限，人事往来简单，可是也有从上海来人向我调查过几次。查问的对象有的人我还不认识，关于他们的事当然一无所知。但来说我不老实、狡猾，改造多年还不靠拢政府，还要包庇坏人。有一次上海来人要我提供关于我一个姓赵的老朋友过去的一切情况，我写好材料通不过，重复又写，还是通不过，说是太简单，没有重点。我又补充了好几次，还要逼迫我再补充。最后我与那人争论起来，我说我所知道的就这些了，我不能无中生有地捏造事实来陷害别人。那来人因此把我告到队部。姓赵的朋友是老共产党员，在抗日战争年代就入了党。可见共产党当权者对他们的自己人还是多方猜疑，信不过，何况对党外人士了。

在文革中，党员和干部间的斗争也非常激烈。一批野心勃勃的人想乘这风浪排挤别人，乘机晋升；还有一批人想借这机会争取入党。我中队有一名干事姓方，非党员，满脸奸相，一看就知是个坏蛋。文革开始后，成了一个造反派组织的头头，自诩为“左派”。整天各处跑，各处查看，什么事都要过问，都要指挥。对农工凶恶如狼，打人骂人，动不动打人耳光。人人怕他，干部们也得让他三分。他还攻击另一职位比他高的干部，目的是想挤那干部下台，来补此空缺。这种事在文革中是普遍现象。

三中队有一个姓钱的干部曾在一次批斗会上被连皮揪去许多头发，后来留下了一块块光秃秃的疤痕，十分难看。因此他经常戴着帽子遮丑，天气很热时也不脱掉。他曾开玩笑地说好在他那时已结婚，否则他这副德性恐怕很难找到老婆了。

批斗运动按原计划要人人过关。但照此进行了不到三分之一人数时，当局又改变了方式，由人人过关改为专整重点。他们认为人人过关不能批深批透，搞不彻底，形成“走过场”，达不到惩恶戒人的目的。这下对被斗的人更不放松，对每一件事都要无限上纲上线，提到反党叛国的高度。每批斗一人常常要搞十多天，遇到问题较多或进行“顽抗”的人搞得时间更长。有一个小组的学习组长与我很熟，他在队部开会时在指导员的桌子上看到拟定要重点批斗者的名单，也叫黑名单，其中有我的名字，他暗中告诉了我，叫我留意。我听了心中很不安，不知如何是好。幸而不久以后还未轮到批斗我，就有一批人从大土堡中队调到乌兰三中队，我也在内，一场近在眼前的灾难总算没有临到我头上。

王政委

我调到乌兰分场三中队，那里的分场政委姓王，被“造反派”斥为“走资派”，隔离审查，天天被左派批斗打骂。几个月下来骨瘦如柴，不似人形。我和他相识，曾在一起研制水稻插秧机。相处虽不很久，但已深知此人公正善良，而且已经年过半百了。

到了冬天，听说他逃跑了。在当时情况下他要逃跑是不可想象的，令人惊奇。他被看管得极严密，身边有两人监视，日夜不断，连他上厕所时这两人也跟着去。

哪知他就是乘上厕所时逃跑的，原来当地的厕所后墙外是粪池，人在厕所内的蹲坑解的大小便从坑洞中流入粪池，清除工作即在墙外进行。到了冬天当地气候严寒，大小便冻得坚硬如石，一点不会沾污衣服。那王政委便是从蹲坑的洞中钻了出去逃跑了。当时是夜间，两个看守他的人分别守在厕所两头的出入口，久等不见他出来，起了疑端，进去用手电筒一照，人不见了，无别路可走，知道他一定是从茅坑洞中钻了出去，逃出墙外。这两人想要从厕所到墙外必须绕一个大圈子，从大门才能出去，墙外是旷野，又当夜间，一片漆黑，无从追捕，只好让他逃跑了。

文革以后，王政委复了职，据他说当时他快被整死，想不如铤而走险，逃跑出去或许

还有生路。他的逃跑计划早已想好，一直等到天冷时大小便冻硬，不致沾污衣服，才乘上厕所机会从蹲坑洞中钻出逃跑。他逃出去后到了北京，潜伏在朋友家。好在不久林彪出事，接着毛泽东去世，接着“四人帮”被打倒，文革结束，他才有可能回到原地恢复原职。

他逃跑以后，妻子便成了当时批斗的重点对象。他妻子姓董，那时四十多岁，在三中队医务所当医生兼司药。她人很好，对农工不摆架子，解放前还是个高中学生。她有一件海虎绒大衣和一双半高跟鞋，解放前是女青年们很普通的东西。有一次批斗她时我正好去乌兰场部附近的商店买东西，见到广场上聚集了很多，四周贴了很多标语，又安装了扩音器。我料到又是在开批斗会，但不知批斗什么人。走近一看原来是董大夫。此前从未批斗过女性，因此很出我意外。我便站在人群中看。只见造反派把她的大衣和半高跟鞋掷在地上，逼她当众穿上跳秧歌舞，并把她称作资产阶级妖妇。她平时虽文雅温和，但在威力压迫下却丝毫不胆怯，死不肯穿。造反派硬替她穿上，她把鞋子踢掉，把大衣扯下。造反派把她按倒在地上，她又反抗，在地上乱滚。造反派揪着她两只脚在泥土地上拖着跑，一时广场上尘土飞扬，弄得她满身是土，满脸是泥血。经此搏斗她已奄奄一息，这才放了她。对这件事，中队农工，还有一些干部也感到愤慨，但在这疯狂的政治迫害的狂流中，没有人敢于出面反对和干预，只是敢怒而不敢言。

文革后期

在三中队，有一天晚上，一件奇事出现。中队召开大会，指导员宣布：“凡有林副主席语录”的人必须把它交给队部，不准私自保存。这事使人感到出乎意外，莫名其妙。当时林彪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他的语录几乎与“毛主席语录”同等重要。而如今忽而要没收，其中定有蹊跷。我当时料想林彪可能出事了，可万想不到是林彪阴谋杀害毛泽东，事态败露后潜逃中丧了命这样严重、这样戏剧性的大事，这件事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此事发生后，全农场的批斗运动和“三忠于”活动逐渐降温。左派积极分子的气焰

也不像前此那样嚣张了。此后不久，天气转暖，进入春耕农忙季节，批斗运动也就冷场了。

在这场大难中我没有受到严重冲击真是大幸。以我出身、成分、学历、经历以及犯罪案由等很浓的政治色彩，加上劳改中表现不积极、靠拢政府不够，如果批斗到我，肯定不会轻易放过，要受尽屈辱，吃尽苦头。

“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大迫害，由中共高层的内部互相排挤攻讦引起你死我活的斗争殃及全国人民，造成不可估量的危害和损失。虽然我的生活圈子不大，交友不广，可是也有三个亲友在文革中死于非命。

一是我的老朋友的妻子，因她丈夫有“反动经历”，被隔离审查。左派对她无止无休地审讯逼供，命她交代她丈夫的“罪行”。她身体孱弱，神经不很健全，经受不了这种刺激，乘人不备跳楼自杀。她住在三楼，窗口下是水泥地，跳下去头部朝下，脑浆崩裂，立即丧命。二是我表嫂，也是跳楼自杀，原因我至今不了解。后来我曾遇见过表兄，他对妻子的自杀闭口不言，我自不便追问。三是我哥哥家的一个邻居，也是在文革中跳楼自杀。这三人都跳楼自杀，无非因为那是最简单易行的自杀方式。另外我的哥哥和姓张的表兄分别由于文革中受迫害和判刑劳改都得了精神分裂症。在我有限的亲友中自杀和发疯达五人之多。推而广之，可知全国受害人数肯定惊人。

据我所识所知的人中，受了政治迫害，经历过镇反运动、长期劳改和文革批斗的惊涛骇浪至今仍旧活着而且神智正常的，我是仅存的硕果，属少数中的少数。有句老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其实生活在无民主、无法纪、无人权的制度下，我心情抑郁，不能自拔，并无“后福”之可言。

到了七十年代中期，我年龄已60开外，进入暮年。虽然我自小健壮，但经历了多年磨难，至此已很衰弱，对农工队的繁重劳动愈来愈感到难以承担。可是农工队中没有退休这一条，只有干到死为止。我不得不做尽力坚持下去的思想准备，心中不免悲观。■

【读者来信】

1. 读者谈向红之文及其专案

人到暮年，情感脆弱，见不得冤屈受苦，读完周向红档案，包括探访“九一三”坠机现场一文，已是泪眼朦胧。向周向红致意致敬。她若来墨尔本，我请她便饭。

又，周的档案里，关于批林批孔及走后门部分，有些新的信息，请谢谢她。■

（澳）孙万国 墨尔本

向红的“探访”冷淡了意识形态。使主流话语披挂在“九一三”上的罪名，在那束白色的百合面前消融。向红“专案”的问世是一奇迹。因“九一三”被办学习班者无数，能保留其档案且敢于令其素面见人者，唯向红一人而已。孟子所说的“虽千万人，吾往矣”可以用在向红身上。特撰四句四言赠向红女士——

大哉向红，至仁至勇；以此裙钗，傲彼群雄。

大哉向红，真性真情；祭彼先君，永光其荣。

大哉向红，何罪何辜？蒙冤半世，笑看荣枯。

大哉向红，可默可鸣；伏彼草野，问此苍穹。■

花开花落 沈阳

优美的文字，详尽的记载和多幅配图，使我也仿佛身临其境，望着远方一望无际的草原和眼前的石碑、土堆，心中默默唱起雄壮的军歌。长眠于此，以及未能随行而在国内就义的先烈们，当年是以何等的勇气去反抗‘伟大领袖’泯灭人性的暴政！

我觉得每一个用心阅读这篇文章的人，必定也都能像我一样，闭上眼睛，心随作者在广阔的草原上驱驰，在先烈们的坟前表达深深的悼念和由衷的敬意。历史终会有昭雪的那

一天。■

(英) 孙之周 伦敦

43年前,我还是毛头兵的时候,部队首长有时星期天会叫我去他家吃饭。一次他和我谈起林彪事件,小声对我说“我就不相信他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从井冈山到北京,是投机。你年轻,要学你爸爸多研究问题,不要轻信,我是二野的,但我相信他带出四野绝不是投机。”当我告诉他,我和周向红是同班同学时,首长说“你应该关心她,她是无辜的,她爸认定自己的事业并为之奋斗牺牲,这才是真正的有骨气的男人!”

从此我开始研究各种问题,并培养自己多角度看问题,提高自己的思维敏感性。林彪问题是我一直在研究的问题之一,参考过大量资料,包括向红、于鹏飞、杜鹃和那些前辈们写的文章、回忆录。这次看了向红的新作,让我深为感动。

“探访”一文思维缜密,文辞讲究,特别打动人心的,是字里行间流淌的真情。向红用文天祥词作祭奠的开场白,令我潸然泪下。她为死难者高歌的首首军歌都是我的最爱,也是我每年“7.28”(平叛战役打响的日子)祭奠逝去战友必唱之曲。呜呼,天降美文,字字惊心,此情此景,纵是石人铁心,亦会泪垂!

向红一生的磨难,铸成了她今天的行事风格。她的前半生忍辱含愤静如深潭之水。因为她知道,愤怒会降低智商,仇恨会丧失判断力。非常感谢贵刊发表向红的新文,我会珍藏和继续研究。送向红一首北宋秦观(少游)的词以示前事:《踏莎行 郴州旅舍》——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

同学 阿宁

感谢发来新刊,尽快读完了,很有分量,有一些感想写着下面。

(1)第167期上的向红《探访“九一三”坠机现场》提到“没有记错的话256飞机失事

现场，他（按：林立果）的那张空军大院出入证上也应该是“吕果”。此处有误，据余汝信主持翻译的《关于一架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坠毁原因的调查报告》，在失事现场发现的林立果的军官证就是写着林立果的真实姓名而非“吕果”的化名。

（2）蒋健先生和王海光先生对于林彪和九一三事件的研究都令我佩服，虽然他们两位也都各有些具体观点我不赞同。第167期上蒋健两篇文章都很有意思，他对于256号飞机上没有安装黑匣子的考证令我信服，对“林叶性关系”说法流传的来源考证也很好。但有一点，蒋健《“林彪强行与叶群发生性关系”考——兼谈王海光的“历史生动性”》批评王海光哗众取宠借“性”黑林彪，这显然是误读了王海光《30年来林彪事件之研究（上）》。

因为王文对于林叶性关系是这样说的：“（彼得·汉纳姆）该调查报告中还提到了另外一些情况，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主要是：1、关于叶群尸体上带有避孕药的事情，张宁对汉纳姆说：林彪得知毛泽东南巡讲话后很紧张，曾到叶群房间与之强行发生性关系，叶群害怕怀孕还找过大夫。……这些问题有的很不可信，如张宁讲的林彪和叶群的关系、林彪与蒋介石有秘密联系；有的已被证伪，如飞机从苏蒙边境折回、黑匣子无信息等，似是苏方故布疑阵。”。显然王海光这种表述不是在黑林彪，而是洗清别人泼在林彪身上的污水。

不过蒋健这两篇文章大大有助于澄清彼得·汉纳姆的调查，即二十余年来由所谓汉纳姆调查所引发的谬种流传大都不是直接出自汉纳姆，而是出自一位莫名其妙的中国记者李安定之口。就像256号飞机上安装有黑匣子、张宁说林彪强行与叶群发生性关系，都没有出现在汉纳姆1994年的英文报道中，而是分别出自李安定的文章《林彪之死真相查访记》和《林彪头骨今安在？》。由此观之，汉纳姆的调查报道要比李安定的文学作品要严谨得多，研究者在引用所谓汉纳姆调查时应该直接援引汉纳姆报道原文而不要被李安定误导。

（3）第168期的周向红专案材料很难得，但第58页、第81页重复编排“周向阳的证明材料”。另，材料录入中也出现不少错植，列举如下。

杂志第3页中：上海空军第一医院“”）政委官健，此处“”）完全是多余；

第23页第一段：我工作不买力气吗？此处“不买力气”似应为“不卖力气”；

第一段：未表示更多的异意。此处“异意”似应为“异议”；

第25页最后一段：我与下开始质问刘副院长。此处“与下”当为“与夏”；

第27页第三段：咱们医院西区教训。此处“西区”显然应是“吸取”；

第30页倒数第二段：作最后的个别。此处“个别”似应为“告别”；

第33页第一段：为什么几个老丈人不出来。此处“老丈人”似应为“老文人”；

第35页第一行：“9、九.一三”以后。此处“9、九.一三”应为“九.一三”；

第73页最后一行转第74页第一行：聚文网仔细回想。此处“聚文网”应为“据我”；

第74页第一段：美做坏事。此处“美做”当为“没做”；

第二段和第三段：她又一次跟我讲、又一次我去大院。“又一次”似应为“有一次”；

第111页第五行和第七行两次出现“哎，差点忘了，搬家的风未断，我准备在万一情况下住招待所。”看起来是重复误植；

第119页第三段：着也叫朋友吗？此处“着”似应为“这”。■

（美）陈闯创

2. 横泽泰夫、秋山枫叶谈老舍

我刚刚读完了第165期第一篇文章《“听话出话”的启示—老舍投湖五十周年》。我虽然读过老舍的几篇作品，可是只读了本期第一篇文章就知道我对老舍的认识多么粗浅。我又想起几年前访问老舍故居时的冲击。放在那里的笔记本上我发现谩骂老舍的短文，我当时觉得很奇怪到现在还有这种不同寻常的现象。■

（日本）横泽泰夫

我记忆中的八月也有个与老舍相关的日子，1985年的8月25日周日，北新桥幽州书屋（老舍书“专卖店”，他夫人儿子经营的，开张十几二十年了）开张，老舍夫人和儿子参加开张仪式，副市长陈昊苏也来了，和普通人一样挤在书店门口等开门。我和他紧挨着，

衣服贴衣服，要不是身边另一位“老舍读者”问他是不是陈昊苏，而他承认了，我都不敢相信这个和我几乎鼻子贴鼻子的人就是“现任”副市长。想想那时再看看现在，今天说这个就像唠上辈子的事。呵呵。当时不明白为何开张找25日这样的日子，后来才意识到可能是为了纪念老舍24日的投湖。那时的我和参加书店开张的众多读者一样，都是老舍的粉，为他的死愤愤不平。多年之后才全面了解他1949年来的所作所为，以及他夫人儿子的冷血无情。这一家人够可以了，他这样的死法也不算冤，冥冥之中自有因果。

启之的文章最后一句：如果老舍先生九原重坐，还会“听话”？还会“出活”吗？我的回答是：会，一定会！看看今日大陆的现状，不用费劲就能找出一堆同类人。我身边就有不少。即便历史重新走一遍，还会是一样的结局。没有第二个可能。这就是这个民族真正的悲哀之处！■

（荷兰）秋山枫叶

3. 范世涛谈“红八月”的自杀

第165期大作开头部分提到“在这段时间里，据官方公布的数字，北京市的非正常死亡1772人。”官方统计的1772人是1966年8月5日至9月23日北京城乡被打死的人数，并不是包括自杀在内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在这段时间北京很多人自杀。如果统计包含自杀在内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结果会远远大于1772人。但官方尚未公布相关统计。■

4. 读者谈范世涛的文革研究

范世涛是文革研究中的少壮派。我很奇怪，他没经历过文革，为什么会对文革那么感兴趣？直到我读了老麦和小迈合写的《毛最后的革命》，才感到范世涛真有先见之明——十年之后，这将是一门压倒一切的显学呀，他是慧眼独具！知道他是读贵刊起家的，让我对贵刊也油然而起敬意。■

北京，皮皮侠

【本刊声明】

本 刊 声 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 13 日，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并告以个人的真实信息，收到后给编者反馈者，皆可免费获得。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版面设计、专栏目录与名称等内容，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

未经著作权人明确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发行、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编辑：梨洲

本期校对：去病

本期版式：华雨